

全球對話

11.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與Nancy Fraser 談社會學

Armin Thurnher

理論觀點

Michael Fine
G. Günter Voss

工作與 勞動

Rafia Kazim, Chris Tilly,
Brigitte Aulenbacher,
Aranka Vanessa Benazha, Helma Lutz
Veronika Prieler, Karin Schwiter
Jennifer Steiner, Ruth Castel-Branco
Sarah Cook, Hannah Dawson,
Edward Webster, Sandiswa Mapukata,
Shafee Verachia, Kelle Howson,
Patrick Feuerstein, Funda Ustek-Spilda,
Alessio Bertolini, Hannah Johnston,
Mark Graham

人類世： 批判際遇

Ariel Salleh
Shoko Yoneyama
Gaia Giuliani
Ulrich Brand
Markus Wissen
Jason W. Moore

馬格里布 的社會學

Mounir Saidani
Mohammad Eltobuli
Hassan Remaoun

議題開講

- > 從對疫情的回應看不平等問題
- > 以Kuhn的哲學理解Ibn Khaldun的典範
- > 社會想像與巴西的法律社會學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1卷 / 第3期 / 2021.12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編的話

氣

候變遷與生態浩劫、不穩定勞動、惡劣的工作環境、貧窮、經濟與社會的全球不平等，這些現象皆是眼下較為迫切的問題。透過社會學的論辯，我們對現代性和資本主義進行深入討論，並省思進步、增長概念和經濟體系如何危及生態與社會的再生產。本期《全球對話》將聚焦於人們對人類—自然關係以及經濟運作的主流概念，在工作、勞動與世界各地的不同生活方式中引發的問題。其中，一部分文章回歸經典的討論，另一些則試圖分析其對未來的影響，還有一些對現代發展的重大議題進行反思。

首先是一場採訪，由奧地利著名記者 Armin Thurnher 與知名美裔哲學家、批判理論學者 Nancy Fraser 對談。其中，她回顧身為左翼的經歷、介紹她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分析，並向我們闡明如今的經濟型態正侵蝕、破壞著社會與生態基礎，而疫情也必須被視為此種經濟帶來的後果。

在理論觀點中，Michael Fine 分析照護問題以及相關勞動的市場化、討論不同的治理模式如何促成照護勞動供應不足與其惡劣的工作環境；疫情與照護機構的死亡事件，也讓我們得以看見市場取向的社會所具有的破壞性。G. Günter Voss 則藉由哲學、政治和社會科學過去與現代的經典，深入討論工作和勞動議題；他也在文章中揭示有償、無償工作與勞動之間複雜的交互關係，以及其對社會生活的意義。

本期刊物的第一個專題裡，作者們結合理論思考和經驗發現，思考工作和勞動議題；文章帶領大家關注世界各地，理解不同形式的工作和勞動面貌，並分析其工作條件。Rafia Kazim 在文章中呈現疫情如何影響印度的移民勞動者，Chris Tilly 則反思不穩定和非正式勞動的全球現象。此外，奧地利、德國和瑞士的一項比較研究，描述了不同的住家照護模式；南非和

英國的學者則關注數位勞動議題，討論了演算法全球南方的平台勞動、線上零工經濟以及「雲端工人」安全等問題。

第二部分的專題中，文章圍繞「人類世」的概念進行了批判性的討論。一部分作者提出其對於人類世的新的看法，另一些作者則對此概念進行批判性的審視。所有文章都對人與非人／自然之間的等級關係進行了批判性反思，其中涵蓋了目前社會學領域中的各種議題。Ariel Salleh 批判現代社會中佔據支配地位的自然概念、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並透過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和社會運動的概念與之對抗。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 Shoko Yoneyama 和 Gaia Giuliani 則認為「人類世」的概念有其侷限性，並指出重新定義人類—自然關係作為理論取向的潛力。Ulrich Brand 和 Markus Wissen 研究「帝國化的生活模式」與對勞動、自然的剝削如何成為霸權。Jason W. Moore 也從類似的角度出發，批判「人類世」的意識形態性質，並提倡以「資本世」的概念進行地理史的分析。

在接下來的專題，作者們對於社會學的發展提出洞見。Mounir Saidani 向馬格里布地區的社會學家徵稿；匯集了來自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利比亞的觀點，對在地的科學界、研究與教學、專業與（非）公共社會學進行思考。

最後，「議題開講」部分則分析疫情下的尚比亞草根行動、Ibn Khaldun 的新科學典範，以及巴西法律社會學背景下的想像概念。■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主編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 [GD 網站](http://GD網站)。

>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 Johanna Grubner, Walid Ibrahim.

副主編: 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 Juan Lejárraga.

編輯顧問: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國編輯: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亞)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阿爾及利亞)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i; (摩洛哥) Abdelhadi Al Halhouli;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Mohammad Jasim Uddin, Bijoy Krishna Banik, Sebak Kumar Saha, Sabina Sharmin, Abdur Rashid, M. Omar Faruque, Mohammed Jahirul Islam, Sarker Sohel Rana, Shahidul Islam, A.B.M. Najmus Sakib, Eashrat Jahan Eyemou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Syka Parvin, Yasmin Sultana, Ruma Parvin, Ekramul Kabir Rana, Sharmin Akter Shapla, Md. Shahin Aktar.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l.

印度: 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Rakesh Rana, Sandeep Meel.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哈薩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羅馬尼亞: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Iulian Gabor, Monica Georgescu, Ioana Ianuş, Bianca Mihăilă, Maria Stoicescu.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廖宇雯, 洪崇仁, 郭智豪, 黃翊碩, 黃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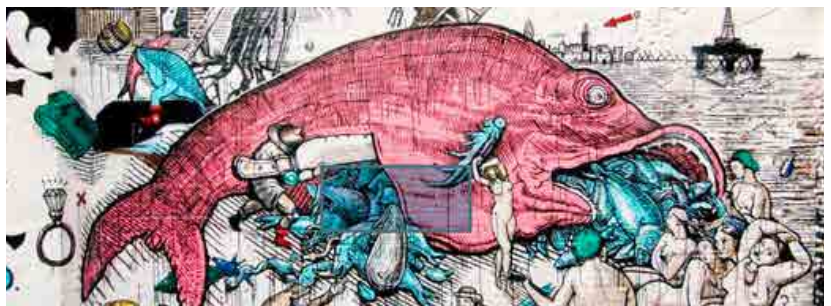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Nancy Fraser 在接受 Armin Thurnher 採訪時, 反思自身在左翼運動中的經歷、分享了她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分析, 並解釋經濟如何帶來這次的疫情, 它侵蝕和破壞了生活的社會和生態基礎。



在此專題中, 作者們結合理論思想和實證結果, 對全球不同形式的工作和勞動進行分析。



藉由和過往理論家對話, 並從迥異的角度對其理論進行批判性驗證, 這些文章針對人類世的概念進行了一場辯論。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編的話	2
------	---

> 社會學對話

疫情——資本主義不合理性之下的一系列災難 Armin Thurnher, 奧地利	5
---	---

> 理論觀點

疫情下照護中心的死亡問題 Michael Fine, 澳洲	9
通往當代的工作理論化 G. Günter Voss, 德國	12

> 工作與勞動

COVID-19 及印度的移工 Rafia Kazim, 印度	16
全球脈絡下的非正式及不穩定的工作 Chris Tilly, 美國	18
奧地利、德國、瑞士照護工作上的爭議 Brigitte Aulenbacher、Veronika Prieler, 奧地利; Aranka Vanessa Benazha、Helma Lutz, 德國; Karin Schwiter、Jennifer Steiner, 瑞士	20
數位時代下工作的未來 Ruth Castel-Branco、Sarah Cook、Hannah Dawson、Edward Webster, 南非	22
破解演算法控制 Sandiswa Mapukata、Shafee Verachia、Edward Webster, 南非	24
線上勞動平台：無法被制衡的權力？ Kelle Howson、Funda Ustek-Spilda、Alessio Bertolini、Mark Graham, 英國; Patrick Feuerstein, 德國; Hannah Johnston, 美國	26

> 人類世：批判際遇

Holding 作為勞動與認識論 Ariel Salleh, 南非	28
宮崎駿動畫：人類世的萬物有靈論 Shoko Yoneyama, 澳洲	30
人類世及其爭議 Gaia Giuliani, 葡萄牙	32
帝國生活形式與資本主義霸權 Ulrich Brand 和 Markus Wissen, 德國	34
拋棄人類世：資本世中的人類與自然 Jason W. Moore, 美國	36

> 馬格里布的社會學

馬格里布社會學：歷史與展望 Mounir Saidani, 突尼西亞	38
利比亞的社會學 Mohammad Eltobuli, 利比亞	39
阿爾及利亞的社會學：教學、運作與地位 Hassan Remaoun, 阿爾及利亞	41
突尼西亞社會學：面臨三重危機 Mounir Saidani, 突尼西亞	43

> 議題開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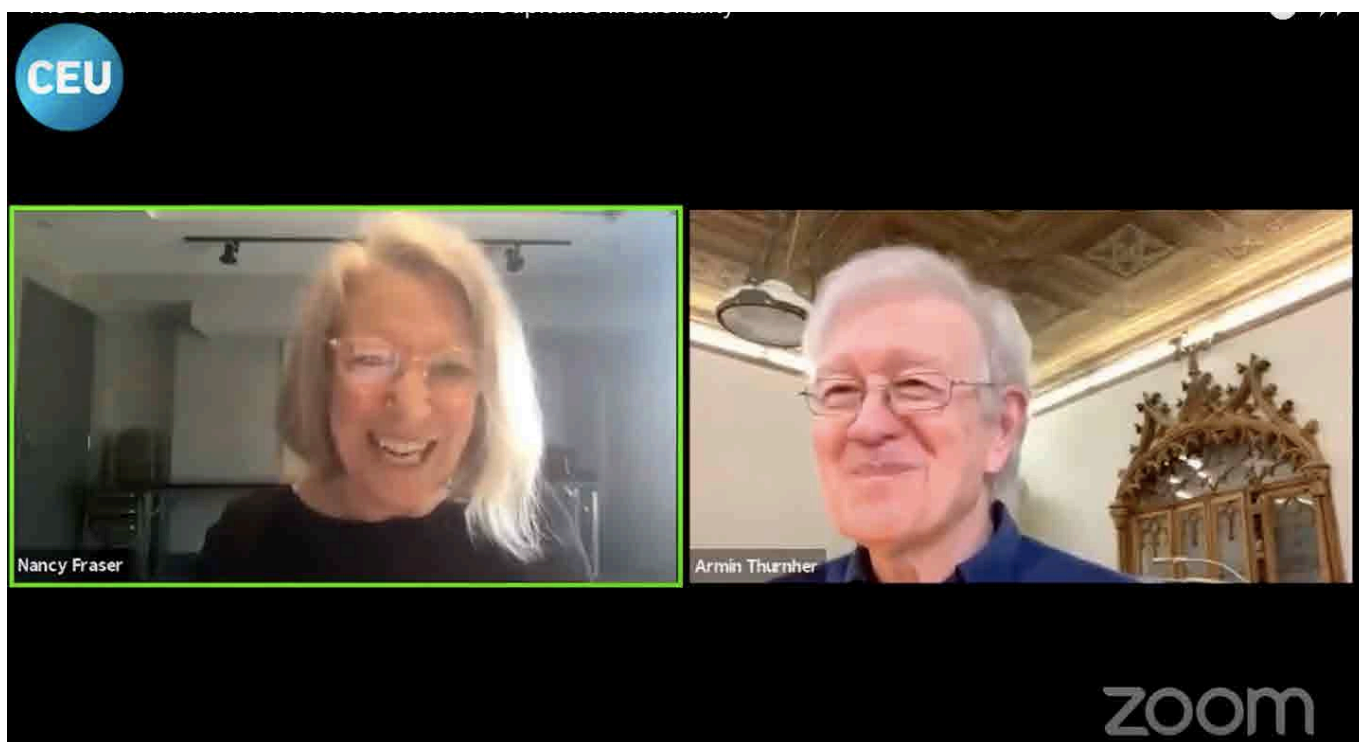
從對疫情的回應看不平等問題 Wilma S. Nchito, 尚比亞	45
以Kuhn的哲學理解Ibn Khaldun的典範 Mahmoud Dhaouadi, 突尼西亞	47
社會想像與巴西的法律社會學 Francisco Bedê、Gabriel S. Cerqueira, 巴西	49

『唯有在照護、自我照護、地球照護的三位一體之下，人類對人類、非人生命、非生命體的责任才得以實現政治價值。』

Gaia Giuliani

> 疫情：資本主義不合理性 之下的一系列災難

Nancy Fraser 專訪



在2021年擔任波蘭尼訪問教授的時候，Nancy Fraser 在 Zoom 上接受 Armin Thurnher 採訪。

2021年五月，知名哲學家、批判理論家 **Nancy Fraser** 和來自新社會研究學院(NSSR)的 Henry A.、Louise Loeb 兩位政治與社會科學教授，以及奧地利著名週刊《Falter》創辦人／出版人 **Armin Thurnher**，進行了一場公開的訪談。Nancy Fraser——首位受邀於維也納市、中歐大學、維也納大學、維也納經濟商業大學、維也納勞動商會，以及國際卡爾波蘭尼學會擔任客座教授的學者，與身為政治記者的 Armin Thurnher，將在本期刊物收錄的這篇訪談中，討論當代的重要議題；並介紹 Nancy Fraser 有關左派的經驗，以及他對資本主義和疫情的分析。

AT: Nancy Fraser，你是如何從政治哲學家轉為一位社會主義者的？我們知道你是68世代的一員，不過那一代人很少成為社會主義者。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NF: 我在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長大，當時那邊還是「吉姆克勞城市」(Jim Crow city)，一個仍

然受到種族隔離法管制的城市。我還是小孩的時候，這個系統對我來說雖然有一些不對勁，不過大致看上去似乎很正常。然而民權運動、種族隔離運動爆發，促使我重新詮釋了我的童年和家庭狀況。我的父母是羅斯福自由主義者，但我漸漸覺得，他們並沒有真正實現自己所宣揚的概念。我於是將青少年叛逆的憤怒，轉移到政治領域；

>>

先是民權運動，然後是反越戰運動，接著是跟著我們這一代人的標準流程——參與在SDS、女性主義等議題中。

關於我如何成為社會主義者，讓我來告訴你們一個小故事。我當時很積極地參與了針對越戰的反徵兵運動。我們鼓勵年輕的美國男性燒掉他們的徵兵卡，拒絕從軍。在這種強烈的激進氣氛裡面，我甚至開始著迷於越南僧侶為了抗議戰爭而自焚的事件。我只是想告訴你那是一個多麼瘋狂的時代：當時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大學生，我邊走在路上，邊對自己說：如果你真的反對戰爭，那你怎麼能不把自己燒死呢？幸運的是，我碰巧遇到了一些托洛斯基主義者，他們對我說，「看，還有另一種方式」（笑）。就這樣，我成為了一名社會主義者，並加入了 SDS 的社會主義。

我一開始以為美國可能會在幾年內發生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後來我終於發現這只是一種幻想。不過，新左派的價值觀和精神對我來說仍舊非常重要。我的基本道德直覺、政治實踐並沒有真的改變。我希望現在的自己已經比那時候更老練，且更能瞭解發展這些直覺和觀點意味著什麼。但68年對我來說還是至關重要的。

AT：對你來說，最重要的老師，還有最重大的學術影響是什麼？

NF：我一開始是就讀布林莫爾學院，那是一間菁英女子大學；我在那邊學習古典文學、希臘語和拉丁語。我的老師是 Richmond Latimore，他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也是《伊利亞特》(The Iliad)的翻譯家——我到那裡讀書就是想要接受他的教學。不久之後，我的興趣轉向哲學，同時也持續使用過去累積的語言知識。隨著60年代的發展，我逐漸感到自己接受的古典教育並不適用於當時的情況——我心中激進的那部分逐漸佔據上風。在對政治與知識的熱情之間，我有過很大的掙扎。Richard J. Bernstein 是我在新學院的同事，也是一位重要的導師，曾幫助我找到兼顧兩者的方法，更將法蘭克福學派介紹給我。我在這個學科中讀到的第一本書是 Herbert Marcuse 的《單向度的人》，這本書打中了我，其描繪出了在社會中生活的感覺——當身處在社會中，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更常是一種疑惑、模糊的狀態，而不是清晰、明確的。

AT：卡爾·波蘭尼是怎麼出現在你的人生中的？你覺得他是個有趣的歷史學家嗎？雖然海耶克的理論具有很高的地位，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海耶克的存在。你認為波蘭尼為何沒有落得海耶克不為人知的下場？

NF：我第一次知道波蘭尼，是在布林莫爾的政治科學課堂上讀到《巨變》。當時他並沒有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我那時候正熱衷於馬克思，在當時的我心中，波蘭尼與之相比可能就沒那麼吸引人。多年以後，當我再次閱讀波蘭尼的作品時，我才意識到他是一位多了不起的思想家，而那本書又是多珍貴的寶藏。所以我開始在課堂中以他進行教學。在重新閱讀和以其作品教學的過程中，我對他有了深刻的認識。我開始認為我的世界觀是圍繞著「兩個卡爾」：馬克思和波蘭尼，兩者皆有豐富的見解，但也各自具有盲點。我認為自己的研究是要將兩位卡爾的觀點，整合成一個單一且更全面的理論框架，並將盲點消除。這樣說並不精確——我關注的不限於兩個卡爾，而是「兩個卡爾+」，「+」指的是女性主義理論、生態理論、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理論——對於這些理論，馬克思和波蘭尼都沒有足夠的討論。

AT：我們來談談疫情吧。當想到疫情，我們通常會認為它是一種自然的、不可預測的災難，與人類的行為無關。在閱讀你即將出版的書之後，我的看法有些改變。請詳細說明。

NF：《食人資本主義》一書中，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寫的，但我將這本書的後記命名為《資本主義不合理性與不正義下的一系列災難》——這就是我對疫情的看法，其是資本主義所有不合理性和不正義的匯聚。一開始，我和你有一樣的看法，認為疫情是一場自然災害。後來，我認識到了一個新的概念，即是流行病學家所說「從其他物種向人類傳播的人畜共患疾病」。COVID-19的病毒來自蝙蝠，它們生活在遠離人類的偏遠洞穴中；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它從未帶給任何人類任何麻煩。然而，有一些事情發生了，才讓這些蝙蝠和一個過渡／中間物種接觸，最後這個物種則和人類有了接觸，我們就是這樣接觸到病毒的。所以問題在於：這些過去彼此疏遠的物種，如今為何產生了接近性？這關乎兩件事情：全球暖化和熱帶森林砍伐。兩者都引發大規模物種遷移，瀕危、不

>>

適生存的物種試圖尋找新的棲息地。許多痛苦的生物找到了新的棲息地，並接觸到了過去從未接觸過的其他物種。很快，新的人畜共患病毒便傳播開來。我想順便補充一件事：這樣的過程和之前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伊波拉和愛滋等病毒的爆發是相同的。SARS是由蝙蝠傳給果子狸、再傳給人類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則是從蝙蝠到駱駝、再到人類。雖然科學尚未有定論，但COVID-19很可能是透過穿山甲或其他中介物種傳播給人類的。在上述的每一種情況下，事件觸發的源頭都是全球暖化和熱帶森林砍伐。那麼，這兩者的背後是什麼呢？資本主義。正是這個系統用溫室氣體衝擊了大氣，導致全球暖化。這個系統砍伐雨林，為採礦和畜牧業鋪路。COVID-19的疫情是資本主義的產物。這絕不是我們將要面對的最後一次疫情，因為那些潛在的因素仍然繼續著。所以，是的——疫情是自然的災害，但其成因不僅是自然的，是資本主義破壞了穩定的自然現象。

AT：而且，令人驚訝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很快就開發出了疫苗，其在危機中也變得非常有創造力。這難道不是資本主義的另外一面嗎？

NT：是，也不是。我們在醫療衛生問題的理解上，太過於重視個體治療層面了。醫療衛生也有公共建設不足的問題，這場疫情使得這點更加明顯。這告訴我們，維護衛生的公共建設是多麼重要——如同我們必須維護道路、橋梁和其他有形的公共建設一樣。在世界上出現突發衛生事件時，掌握著大部分應對能力與資源的人是私營企業：其掌握了勞動力、原料、機械與生產設施、供應鏈和智慧財產權；但他們對公共利益卻不感興趣、關心的是利潤和股價的底線。我們在目前關於疫苗智慧財產權的抗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點，這關乎到疫苗是否會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提供給全世界使用；如果我們想要控制病毒，就應該且必須達成此目標。公共衛生能力的私有化，即是此目標的巨大障礙。

現在，我們來討論你對於資本主義的辯護。首先，是疫苗得以快速開發，大部分的是來自公共部門的努力，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我只知道美國的情況，但其他國家也有許多公共貢獻——這當然包含古巴、中國和俄羅斯，也許還包含其他國家。無論如何，許多準備工作使我們口中的莫德納疫苗，有機會在國家衛生研究院

的努力下完成研發。如同網際網路，美國國防部也是先驅；網際網路最初是公共產品，後來才被Google、Facebook、微軟、蘋果等公司收購。在這兩種情況下，技術最初都是由公共部門開發的。因此，資本主義有沒有明確值得讚賞的部分，我並不能給你一個明確的正面回答。我會說，應該得到讚揚的是科學，而科學可以——也已經有過許多在公共機關支持下發展的案例。

AT：但是美國有個問題：它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而且沒有人喜歡這個政府。顯然，像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以及像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這些可以自我隔離，並採取更強硬措施的民主國家）在對抗疫情上取得了成功。在歐洲，人們則傾向過分強調公民自由受到威脅，而忽視了公共衛生的措施。

NF：美國的這種問題更加嚴重。1月6日有一群人入侵國會大廈，嘗試要阻止或推遲拜登的總統選舉獲勝；在川普的鼓動下，這些人有一個「深層政府」(the deep state)理論。他們相信一些非常奇怪且危險的陰謀論，包括不承認新冠病毒、氣候變化的真實性，認為一切都是為了加強政府對人民控制的騙局。這些想法深深扎根於我們的政治文化——強烈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之中。在右派川普支持者民粹主義的生態系統中，這種對政府的懷疑如今已經變得極度狂熱。作為一名左派，我對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抱持著許多反對，例如入侵伊拉克和其他可怕的事情。我更願意依賴國際機構，假設它們有能力、獨立於大國之外。不幸的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世界衛生組織並不強大，可能沒有以最好的方式達成他們的責任。但無論如何，當面臨緊急的衛生事件時，我們必須依靠現有的公共權力。而做得最好的國家——我想包括中國——是那些民眾對於公共權力相對積極的國家。他們也許需要更民主的公共權力，不過他們不是瘋狂的自由意志／個人主義者。相較於對市場的支持，美國政府一直難以行使權力。美國迅速地讓大約1億人接種了疫苗，但由於人民對疫苗的猶豫和抵抗，接種陷入停滯。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引入疫苗護照是更好的做法。不管要去看籃球賽、劇院，你都需要證明自己已經接種了疫苗，或者是出示其他有效的醫療例外證明。這可能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但在某些情況下，你需要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如果禁止在餐館吸煙，或是對不繫安全帶的司機罰款是可

>>

以的，那麼將拒絕接種疫苗的人排除在室內公共集會之外也是可以的。

AT：在這種不受控、反國家和反公共溝通的環境下，新的社交媒體作為一股全球力量，你認為不滿與不同意——而非同意——如何被製造出來？

NF：我不會說我們製造不滿。我會說，是資本主義製造了不滿。我們正處於一場嚴重的、多維度的全球危機之中，這是一場危及整個社會秩序的普遍危機。新冠肺炎只是其中一方面，還有許多其他面向：經濟、生態、社會和政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普遍認為社會制度和政治領導者辜負了人民。不滿無處不在——這是理所當然的。右派、獨裁且排外的民粹主義，即是這種不滿的表達，雖然他們對於事態的源由與解決方式，有著極度錯誤的理解。不滿的形式也有比較好的，像是左派民粹主義和 Bernie Sanders 運動，它們代表了更具理性、更有希望、更多解放的形式。不滿是存在的。但你是對的，這些不滿和各種過程交織在一起。例如，例如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和網紅，看似背離了新自由主義的傳統，卻仍然在社群媒體的演算法環境下，強化了群體思維和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所以，情況是很複雜的。

說了這麼多，我除了一些理論之外，也沒有製造其他的事物。我希望自己創造的理論能夠幫助那些，因為各自的原因、在各自的處境中面對困境的人可以得到問題的解答；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口，困境有著不同的樣貌。許多人確實進行著抗爭、運動，且對於現實並不滿足。他們想要改變，並正嘗試從對於「改變什麼」、「如何實現改變」的不同理解中實踐。我試圖介入此過程，並指出很多導致不滿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件事——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社會的形成基礎，本質上就是要吞食自然、將財富和種族化的勞動人口集中、不重視照護工作的價值、犧牲維繫家庭和社群的能量，甚至掏空能夠解決問題的公共權力。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幹的好事，也是寫在其基因之中的本質，並不是偶然。所以，我想說的是：將社會系統作為地圖，去看清楚你的不滿和他人的不滿之間有什麼連結——我們要認知到，不滿只有一個源頭，一個共同的敵人。讓我們團結起來戰鬥吧。■

來信寄至：

Nancy Fraser <frasern@earthlink.net>

> 疫情下照護中心的死亡問題

Michael Fine, Macquarie University, 澳洲, ISA成員、前ISA老年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11)副執行長



2021年4月，一家人來到療養院探望祖母，這家療養院因疫情的限制措施而被分隔於玻璃兩側。來源：公用網域。

疫情的社會迴響，從家庭和虛擬環境中人際互動的微觀層面，到照護實作與照護關係所影響到的，整體國家人口及其跨國互動的宏觀層面。這些行動都需要被理解為照護的形式。

近年來，去發展承認照護重要性的理論，對社會理論和社會學研究變得越來越重要。來自2020到2021年的疫情證據顯示，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回應令人痛心。雖然少數國家的公共衛生措施表明，限制疫情的影響是有可能的，但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在掙扎著。

在疫情的壓力下，國家承擔了整體的照護責任，承擔了支撐和保護人口的任務，並在管理他們的福祉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由於市場無法應對，並有完全崩潰的風險，政治領袖的反應，當時是湊合的，在管理往後的事件時也僅有部分是成功的，且這樣的成功是由國家機器的憲法權力、制度和慣例來構建的。

在過去的兩個半世紀裡，從封建主義與傳統到全球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型時代，產生了現代世界，在波蘭尼所說的“市場社會”中出現了越來越複雜的一套提供照護的社會體制。在最新近的階段，當代福利資本主義的重組看到大多數先進經濟體的國家利用其權力，通過促進服務業市場來改變整個照護體系。這些市場和各種形式的准市場的運作，從兒童照護和教育，到整個生命進程中的身心障礙支持和醫療照護，再到老年照護和住房，已經逐漸地支撐並塑造著我們的現代生活。

在這個過程中，對社會理論最重要的一個挑戰是大多數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特別是西歐和北美，明顯地沒有作出相對有效的反應。這些富裕的已開發國家通常在全球享有高生活水準的富裕人口名單中名列前茅，這些國家擁有所謂的有效管理系統和表現良好的衛生和福利體系，卻顯得特別脆弱。

2020年，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先是被病毒的傳播，而後又被醫療服務的問題所困，無法有效控制疫情。2021年，疫苗供應和覆蓋率的問題，伴隨著一系列極端保守的陰謀論動員和對養生和自然療法的天真信徒，其對疫苗的普遍敵視和懷疑，似乎呼應並複製了，大多數富裕的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最初的錯誤決策。

這場疫情所暴露的社會規範和治理問題以五花八門的形式表現出來，也許沒有什麼比整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中，數十萬名在照護中心內的，可以被避免的死亡人口還要更令人感慨和悲慟。從這個意義上說，照護中心是一個案例研究，是一個微觀世界，在這個微觀世界裡，我們有可能識別和劃分出這一流行病在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上的照護提供和規範的更廣泛系統中所暴露的許多問題。

在照護理論的基礎上，這裡提出了兩個來自波蘭尼對市場社會產物的分析，目的是促進對照護的政治經濟層面理解，並為應對疫情的國際研究提供參考。首先指出了照護市場化帶來的治理問題；接著涉及公共照護商品化的後果，特別是表現在照護人員和其他一線工作人員日益不穩定的勞動依賴上。

> 照護中心內的死亡

在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期間，死亡率數據往往是不可靠且被低估的。一些國家在最初的全國染疫總數中遺漏了護理中心的死亡人數。國際長照政策網在2021年2月公佈的[最新資料](#)顯示，在疫情的第一年22個有可靠資料的國家中，平均有41%的COVID-19死亡者是照護中心居民。這從澳洲所有Covid死亡人數的75%，到韓國報告的僅8%不等。在可獲取資訊的大多數國家，這些數字都高得不成比例。在加拿大，59%的Covid死亡病例發生在照護中心、荷蘭為51%、瑞典為47%、奧地利為44%。在美國，有139,699人死於老年照護中心，占疫情第一年全國死亡總數的39%。

照護中心由國家資助和營運，以照顧和保護需要支持的老年人。它們應該成為避免傳染的避風港，為其居民提供保護。相反，它們成了最脆弱的年齡組中的感染傳播中心，證明了公共政策在提供保護方面的普遍失敗。與家庭看

護比較，照護中心在預防傳染上的失敗不能歸咎於其居民的年齡或慢性病，也不能歸咎於個別工作人員的失誤。儘管在每一次染疫事件中都有一系列特定的、地方的因素影響，但這種死亡的全球現象強調了一種更有理論基礎的社會學方法之重要性，這種方法使公共照護體系的失敗，背後隱含的共同因素變得清晰可見。

在包括澳大利亞的許多國家，進步的聲音認為，這些死亡是政策的結果。允許養老院通過私人企業運作，將利潤置於人之上。儘管在一些國家有很多間接證據支持這一論點，但國際間的比較結果顯示，追求利潤和死亡之間的確切聯繫既沒有因果關係，也不是普遍現象。一些營利性養老院有很多人死亡，但多數的卻沒有記錄。與此同時，一些非營利性養老院也報告了大量的Covid死亡案例。在其他國家例如荷蘭和瑞典，有大量的死亡報告，不能與業主對利潤的追求聯繫起來。

> 市場化和治理

然而，市場的聯繫不應該被忽視。國家對養老院的支持是為了應對市場的歷史性挫敗而發展的。但在過去的20-30年裡，照護市場在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被重新引入，有效地確保了所有受影響的養老院的運作被置於市場競爭的壓力之下，無論其法律所有權為誰所有。這個過程（市場化）與波蘭尼記錄的19世紀和20世紀初引入自由放任市場體系的過程相呼應，也很相似。在每個時代，市場體系都是由政府有意創造的。

今天，市場化出現在照護和人性服務領域，既是橫跨整個系統的合法化邏輯，也是塑造其組成部分之間以及內部互動的執行模式。它的作用是通過打破階級制度和官僚權力的關係，縱向地裂解整個系統，橫向地破壞與顛覆地方和區域層級的合作以及內部的服務和設施。儘管波蘭尼沒有使用這個詞，但對“治理”問題的理解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假設，有助於解釋Covid死亡案例和市場化之間的聯繫。更重要的是，治理的概念是與市場化同時出現的，並且在實踐中與“新公共管理”等意識形態有所關連。

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權力被越來越多地下放給企業層級的管理，在那裡，保密和獨立優先於合作和系統整合。在照護中心，市場對消費者

>>

選擇的重視伴隨著對更傳統的醫療衛生責任的轉移，在許多情況下影響了專業人員的要求。照護中心因此越來越不適合管理防疫。儘管如此，照護中心被要求作為獨立的單位來運作，因為它們被公共衛生措施有意地與更廣泛的急性健保服務系統，特別是醫院隔絕。可以假設，它們的自主管理使它們特別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

> 不穩定看護工作的結果

與市場化密切相關的，還有照護中心對不穩定的低薪勞動力依賴逐漸增加。市場的壓力已被廣泛用於降低工資成本，以控制財政支出，同時繼續確照護產業的投資盈利。這導致了成本的降低，在Covid爆發之前，成本降低代價主要是由看護人員和照護中心其他重要的家庭看護承受。

許多流行病學研究和衛生當局的報告都指出了這些工人豪無保障的就業環境，與照護中心內部和不同照護中心之間的傳染有所關聯。被迫在多個不同的照護中心工作或從事不同的工作以賺取生活費的不穩定工人，顯然塑造了疫情對照護設施的破口。因此，不穩定的看護工作增加反映了市場已經達到了極限。因此，現在為維持照護服務所採取的措施反而對其安全造成了威脅，並破壞了其長期的生存能力。因此，正如Brigitte Aulenbacher和她的同事最近所論證的那樣，將照護服務作為一種商品來進行市場交易，似乎看到照護實際上已經成為波蘭尼所說的「一種虛構商品」。

> 結論

從護理院提供的護理的角度來看，這場疫情的影響是具有廣泛破壞性的。但它們是反常的，也暴露了市場化的局限性，並創造了國家回到社會和政治規範核心的必要和流通條件。這是否也是更深層次變革的預兆，即博蘭尼式的雙重運動概念所確定的那種可能的歷史轉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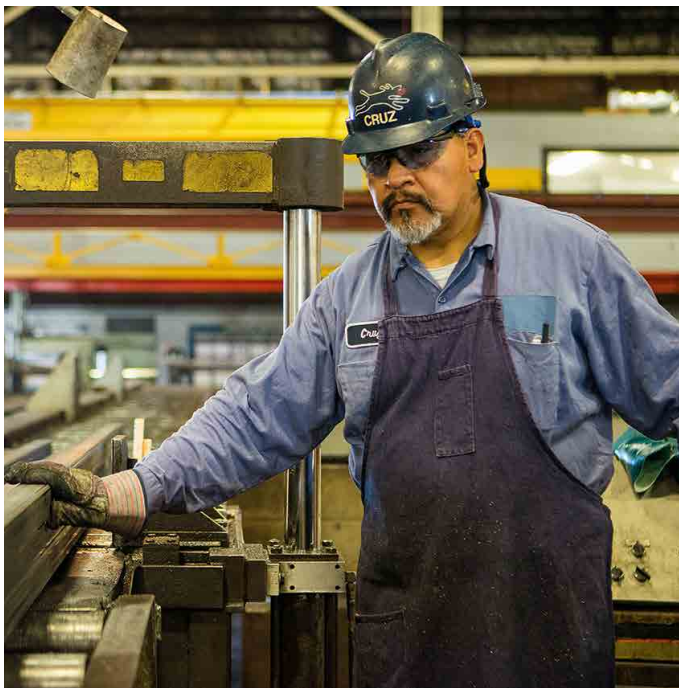
全球性的疫情危機及其在各國的表現點出了一個民主社會學習的機會，即重新將照護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福祉看待，而不是看到它繼續被當作一種已經成熟的經濟商品甚至更進一步的剝削。然而，是否可以期待一個進步的和受歡迎的社會運動出現，以回應病毒所揭露的失敗？如果是這樣，需要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以確保其成功？它可能採取什麼形式？正如在大流行病的頭兩年裡，由陰謀論激發的、以日益激進和無法容忍的國家政治民粹主義形式為基礎的反疫苗運動，其崛起所表明的那樣，這肯定是疫情為社會理論和社會學研究提出的關鍵問題。■

來信寄至：

Michael Fine <michael.fine@mq.edu.au>

> 通往當代的工作理論化

G. Günter Voss, 榮譽教授, Chemnit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德國



在工業資本主義中，將工作視為經濟活動的狹隘觀點根深蒂固，其他形式的工作（如家務或家庭相關工作）進一步被邊緣化，幾乎成為「隱形的工作」。

來源：（左圖）創用CC，（右圖）國際勞工組織亞太分部。保留部分權利。

在社會學術語中，工作可以被理解為一種使用身體力量及精神-身體技巧的有目的之人類活動。就其它標準（如成就、效用、工具、薪資等等）往往作為主要方面而加以引用的事實來說，此一範疇還遠未被明確定義。即便工作是由個體所從事，它至少是以不那麼直接的方式被整合進且型塑於持續變化著的社會脈絡中，而後者是以勞動的分工（合作社、組織等等）為基礎的。

> 什麼是工作

不像其它概念一樣，工作的概念在科學的以及特別是在社會實踐的方面受到歷史變遷的影響。最近，出現了關於工作究竟是什麼或應該是什麼的問題的激烈爭論。以下是關於如何更清楚地對工作進行定義的一些反思。

一個長久的問題在於工作是否全然的「負擔」，或者它也能提供「愉悅」(pleasure)——基於其所能帶來的成就感——並為積極的自我發展提供重要機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隱藏在這一區分中。其中之一視工作為人類存在的基礎，構成了經驗不可或缺的機會，缺少此一機會將意味著對本質性的人類需求甚至人類尊嚴的真實否定(veritable denial)。然而，工作的具體歷史表現已經（並將持續地）與社會中的許多群體的負擔和危險聯繫在一起，導致了徒勞無功的各種新形勢。此一區分也體現在拉丁語單詞 labor（陣痛或艱難）和 opus（創造以及被造物）之間的差異中，後者也反映在英文單詞 labor（其中包括有分娩的意思）和 work 之間切且更進一步地體現在德文單詞 Arbeit 和甚少使用的 Werk 之間的差異中。

>>

當然，眾所周知這是馬克思在兩個方面（「工作／勞動的雙重個性」）之間所做的區分（當然也是亞當·斯密甚至亞里士多德所做的區分，後者使用了「oikonomia」和「chrematistics」這樣的術語）：一邊是透過「具體」的生產性勞動創造實際的「使用價值」，另一邊則是透過「抽象的」勞動生產經濟上的「交換價值」。據其論證，上述對照在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得到了系統性的促進，從而導致了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

雖然發達社會中對勞動者的活動主要是為了賺錢（「能獲利的工作」）的假設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如今更廣泛的工作概念卻反映了人們日益認識到，工作的概念在歷史上呈現出了多樣的形式，不僅在實質上有所不同，而且在社會感知上也有所不同。這也表示了工作所採取的特定形式過去常常且如今仍是從屬於持續的變遷的。在收入導向的形式之外（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各種各樣的基於工資的勞動，而對少數人來說則是，大量的形式的自我僱傭），存在著值得注意的多樣的工作表現：「志願工作」或「公民參與」（尤其不以賺錢為目的）；「基於任務的」或「政治工作」；「家務活」（採購、煮食、清潔等等）；「家庭相關和照顧的工作」（育兒、看護、老人照顧等等）；「自給自足的工作」和「生計工作」（包括提供自給自足的那種直接生產）；「強迫性勞動」（由罪犯、應徵入伍者、奴隸所從事）。

同樣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工作被相當直接地視為主要是物質的「生產性」活動，雖然各種事實證明了這是對現實的不準確的描述。人們逐漸地承認即便是「非生產性」的工作也非常重要（比如行政工作和以知識為基礎的工作）並且那種長久缺乏認識的「服務」（比如直接或間接的個人的、資訊的、金融的和技術的服務）也漸漸地變得重要起來。

並且，同樣顯著的是，人們不太情願地承認明顯具有毀滅性的工作不僅只有幾種變體（戰爭相關的工作、暴力犯罪活動、傷害性改造以及／或者對自然世界的徹底破壞）。由此可知工作總是表明了其持續改變的形式，亦即在現有形式（比如一棵樹）的毀滅中創造出新的形式（比如一張椅子）。

此外，對於工作的被廣泛訴諸的「效用」之評估也根據其各自的優勢而有著很大的差異：乍一

看來有利的事物在其它的情況中可能轉變為實質性的不利；短期內可能有益的事物長遠來看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害。

當今以新的形式出現的還有如下問題，即究竟工作是一種固有的人類特徵因而屬於作為馬克思所稱為「類存在」（species-being; Gattungswesen）的人類進化上的獨一無二的核心特徵，抑或者其它活物也同樣能夠從事（perform）工作？近期的民族學研究發現表明類似工作的活動、對基本工具（rudimentary tools）的偶然獨立的使用、甚至是確定形式的生產等都不專屬於胎盤動物，更別說專屬於人類了。馬克思事實上已經承認了動物能夠從事工作且使用工具。他因而主張人類勞動的特別之處在於工具的生產，但更重要的是有意識地操作，而正是後者——以馬克思自己使用過的表達來說——從「最好的蜜蜂」中區分出了「最爛的建築師」。今天，我們必須補充一個（有時令人相當不安的）問題：在何種程度上複雜的機械和流程（比如靈活的自動化、機器人、人工智能）也同樣能夠從事工作？

> 隨時間而變化的工作概念

上述的概念上的張力顯示了在其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的、如此高度分歧的工作觀念表示了一個固有的社會學關懷。為了說明這點，讓我們簡要地回顧一下歷史：

- 在古希臘羅馬時代，當透過體力活動為每一天的實際生活製造（如今被理解為「勞動」）物品歸屬於不自由的奴隸和女人的主要任務時，留給完整的（男性）公民的則是政治的或哲學上的智性工作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兵役。而工匠的技藝（techne）則表現為中間形式。

- 在歐洲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封建制度中，一般的工作概念指的是主要由不自由的個體所從事的大多屬於農務的體力活動。除此之外還同時存在著被精英（貴族、聖職者）所追捧的「自由」活動。在此蘊含了那種將體力任務視為對伊甸園中人的失落（Fall of Man in Paradise）的神聖懲罰之持續否定性的解釋（construal）。與此上述懲罰相對，被高度重視的是實際的宗教實踐（敬拜服務）。此種對於工作的理解逐漸導致關於實際的體力活動的肯定性看法，即後來被視為一種

>>

神性的反映(reflective of divinity)或甚至是神的意志。在修道院中，出現了一種工作文化，在該文化中，生產性工作雖然仍不等同於宗教服務，但得到了明確的讚賞(ora et labora)。

· 在城鎮建立的背景下，不斷擴大的手工藝文化、跨區貿易和技術進步的結合不僅促進了對生產性工作的高度評價，卻也同時促進了一種為善而去—禁止(de-tabooed)的賺錢導向。路德及其改革為能獲利的工作指定了一種近乎神聖法令(divine ordinance)的狀態(即所謂 a “calling” 或者 Berufung)。韋伯在其關於新教倫理的論文中強調了這點，透過作為西方(「西洋的」)資本主義的關鍵基礎的對職業成就的渴望(aspiration)確定了「不懈的努力」(restless effort)，從而查究加爾文主義預選說(predestination)中固有的神聖選擇性(divine chosenness)的跡象。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同時地強調了工作作為個體自我實現的基礎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作為一項自然人權的話。

· 在工業資本主義中，伴隨著其它形式的工作(比如家務活或家庭相關的工作)在文化上的進一步邊緣化甚至近乎成為「見不到的工作」，一種將工作視為經濟活動的更狹隘的工作觀佔據了主導地位。被人們正式地認可的工作形式被認為是基於越來越專注於獲得相關技能的專業化活動。大多數的人(包括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兒童)不可避免地依賴於通過在專業化市場(「勞動力市場」)上有償出售其勞動力來獲得現在所需的貨幣謀生手段。其中被拒絕或失去了就業機會的個體將會被視為「失業者」，亦即「沒有工作」的人(儘管在某個意義上他們並非沒有工作)。

工作的實際歷史與不斷發展的社會上的工作概念同時展開，但兩者並不相同。在各種情況下的主導觀點往往捕捉到的僅僅是相關工作活動的快照。相比之下，許多對社會重要的任務被系統性地忽視進而遭到貶值。除此之外，工作的實際歷史往往是「工具」的歷史因而是人類作為「自然存有」(natural beings)與其自然生存條件和其「內在本性」(inner nature)相互作用的歷史(馬克斯)。在此意義下，工作的歷史一方面是人類能力和技能、技術可能性以及對本性的潛力之利用的驚人發展的歷史。同一時間，它也是對自然的和文化的價值的毀滅、對人類的

剝削和異化以及不斷重複的徒勞無功的形式的歷史。這直至今天仍然有效，且不斷地加劇進而導致與現代資本主義中心的距離越來越遠。這不僅包括了那些——在在地和全球的範圍內——從工作中因此從能夠使他們自我持存的就業機會中被系統性地排除的人們的歷史。自從工業化初期出現的異樣的大規模貧困透過在某些地區建立(有限的)社會保障系統而得到緩解，伴隨著社會保障系統和就業關係的撤銷管制的危害再一次普遍地增加。偶爾對許多人來說驚訝的是，經常有證據表明即便在全球北方(的福利國家，與工作相關的疾病不僅表現在身體上，且還表現在眼中的心理狀況。

> 工作的社會學式理論化

社會學一次又一次地致力於工作的主題(儘管往往只是選擇性地)。過程中，社會學家借鑒了不同學科的概念。但社會學理論的形成只有到了二十世紀之交才變得更加的廣泛。以下將以一些例子來說明這點：

· 黑格爾伴隨其觀念論主體哲學，是最具影響力的早期現代工作理論家。他認為工作構成了一種在智性的引導下的「外化」(同時也是自我的「異化」)，以作為人類在他們的產物中看到自己並透過對這些產物的主體性「佔有」(subjective “appropriation”)而獲得其「自我意識」。

· 馬克思從黑格爾出發，卻認為工作並非「純粹智性的」，而同時是「感性的人類活動」和住一套的經濟生產活動。他發展其最初對工作的一般肯定性的觀點進而將其擴展為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指的是資本主義通常的工作形式即作為異化的「僱傭勞動」——下的勞動的全面分析及批判。根據馬克思，人們只有將他們的「勞動力」，比如他們的工作能力，作為商品出售方能生存。在工作場所的背景下整合到被控制的和受監控的流程的工作構成了為產生「剩餘價值」和經濟「利潤」的經濟剝削的基礎。由此，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一種自我決定的人類工作經驗的可能性將系統性地遭到扭曲及終極的破壞。

· 涂爾幹在其一篇早期著作中發展了一種社會分化的模型。對他來說，所謂「勞動分工」意味著一種範疇化，後者將社會能力分類為特殊化的專業功能。他根據歷史的角度看到了從不發達

的「機械的」分工而成的相似的社會單位（「勞動的部分分工」，伴隨著透過集體價值所確保的「團結」）到差異化的「有機」分工而成的逐漸相異的單位（伴隨著一種從功能性依賴[functional dependencies]中升起的異樣的社會結合[social cohesion]）的轉變。

· 鄂蘭區分了人類活動的不同基本形式。她從亞里士多德的術語即 *poiesis*（製作、生產）和 *praxis*（自由人或其靈魂的活動）出發發展出了三種類別：第一是作為服務於物種的物質性持存的活動的「勞動」(labor)，這一活動並不意味著自由，而只是維持生命所必須遵守的絕對律令。第二是與前者有著鮮明對比的「工作」(work)，即對日常所需的耐用物(durable things)的物質生產，後者伴隨著一種對人類經驗來說十分陌生的包羅萬有的「人造」(artificial)世界。第三是鄂蘭認為與透過理解形成的社會多元相關的第三類活動，即「行動」(action)——類似於亞里士多德的 *praxis*。在其中，個體能夠在不從事「勞動」及「工作」的情況下生存，但作為一種社會存有(social being)，此個體乃是本質上依賴於政治「行動」的。

· 哈伯馬斯對比了兩種人類活動：在勞動形式下面向功能性物質生產的「工具性的」活動，以及屬於社會性生產的「溝通行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認為社會「生活世界」中社會性地不可或缺的理解導向的行動受到了主要在效率導向的「系統」(經濟、社會)內實行的工具性行動的威脅。

即便「工作」(廣義地說)表徵了人類活動相當重要的部分，但人類的實存不能化約為工作。人類並非(似乎仍有人如此相信)主要是貪得無厭且生存於一個「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的痴迷於工作的生物。如此的觀點無法捕捉到其它重要的人類活動之獨特性。諸如「休息」、「娛樂」或者「運動」等範疇都試圖地要合併此一「他異」(other)——然而往往在嘗試規定精確定義之時會遇到同樣的困難(比如就工作的運動和遊戲方面而言)。關於工作概念的第一要務在於克服奠基在靜態的真理宣稱(static truth claim)上的二元觀。於此更為相關的是基於靈活參數(flexible parameters)的關係性理解，後者幫助我們辨識「工作」在不同活動中所表徵的特點。只有這樣上述強調的現代工作的形式和觀念的多樣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來信寄至：

G. Günter Voss <info@ggv-webinfo.de>

> COVID-19 及 印度的移工

Rafia Kazim, LNM University, 印度, 教育社會學(RC04)、語言與社會(RC25)、女性與性別和社會(RC32)、視覺社會學(RC57)等研究委員會成員



在德里拉賈斯坦邦邊境，於2020年宣布第一版本的隔離政策後，移民工人正返回自己的村莊。
來源：Ibsar Hussain。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的2020年3月24日晚上，印度政府突然宣布要進行第一波封城，這顯示了印度政府並沒有準備好如何應對疫情及任何健康危機。在全國戒嚴開始前只剩四個小時的自由時間，這讓印度公民陷入了一團混亂。國家對移民者和城市貧民的漠不關心從實施封城的方式中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們也沒有考量到這會直接對日薪工人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絕大多數人手頭上沒有任何積蓄，再加上面對不確定因素，挨餓的危機可能迫在眉睫，他們被迫返回家鄉。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在進行第一波封城的第一週，就將近有 50,000 名移民開始起身從德里和孟買等大都市返回家鄉。

一群步行數英里回家的移工在路上喪生的案例，更是進一步地暴露了他們的危險處境。5月8日，16名睡在奧蘭卡巴鐵路軌道上的移工，遭一列乘載貨運的火車輾過。政府沒有責怪那些無情毆打移工，並嚇唬他們走另一條相對輕鬆的路

線的警察，而是將所有責任都歸咎於那些愚蠢到會睡在軌道上的移民們。返家的移民就這樣死於遠離家鄉的過境路上，他們不是死於 COVID-19，而是死於政府的冷漠。

諷刺的是，對於「福利國家」而言，貧困人口仍然只是「標的人口」(target population)，沒有任何「合法公民」的感覺。國家為他們制定的福利計劃很少，而且這也只有可以在從他們那裡獲得政治收益時才會這麼做。

> 典型的非公民！

移民的生活充滿著艱辛與不確定性。形成這種不穩定基礎的，是移民在一群充滿敵意的城市居民中所體驗到的疏離感。對於自稱是公民社會合法公民的城市居民來說，移民是「無名的他者」(anonymous other)，這是一群人口統計和實證類別下的人。人們雖然需要他們去清潔房子、城市，以及修建道路、橋樑和購物中心，但他們仍被視為會破壞城市景觀美學的全民公敵而不受

>>

歡迎。正是這種國家及其「合法公民」的集體敵意性厭惡，使得城市貧民即使在一般時期也難以生存，而在自然的緊急狀況下更是如此。這些移工作為「無名的他者」生活在城市空間的邊緣地帶，並沒有辦法發展出他們對城市的歸屬感。

> 認同和歸屬

政治下的認同和歸屬可以顯現出一個人是誰、不是誰。換句話說，可以指出一個人不屬於哪裡。對「家」的理解是由歸屬和認同的相互作用所形成，而並不是僅僅由空間性或時間性來定義，所以即使在城市工作多年後，移民們仍渴望返回家鄉。也因此，「歸屬」是指無意中創造的社會經濟、文化、地區和種姓的界限。例如，在德里的一名比哈爾邦移民會開始意識到他是誰以及他屬於哪裡，這是因為多重邊界的產物突顯了他作為比哈爾邦人、移民、勞工、日薪工人、貧民窟居民等身份，既粗魯又不乾淨，是城市空間的非法進入者。「德里的合法公民」會引用他們的地區認同（即比哈爾）去套用在任何類型的暴力、意外、事故或犯罪活動。這些「合法公民」認為，他們已經獲得了德里的合法所有權，並隨之得到了德里的安全保障。

> 只是為了悲慘地死去？

根據 Judith Butler 的說法，「悲慘」（grievability）是一種功能，能夠釐清誰算是人、誰的生命算是生命、誰的生命值得悲傷。由於移工和城市貧民是「無名的他者」，所以被認為是不值得人們悲傷的無名之輩。因此，他們認為死在自己的家（個人所歸屬的地方）會提高這種悲傷的程度。因為事實非常地明顯，個人是依附於他人的「社會建構的身體」。因為失去伴隨著轉變，所以存在著失去。失去會給那些與逝去的靈魂有關的人們帶來轉變。明顯地，對於這些移工來說，選擇在哪裡死去比怎麼死去更重要。原因很簡單，因為在他們的故鄉裡，他們的死亡和隨之而來的悲傷至少會為他們贏得一些作為人的尊重，而他們也不會被視為無名、無家可歸、可有可無的人。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數以千計滯留在印度各地的移工們，不計後果一定要回家的原因：他們已經準備好要迎接多重的威脅——疫情、飢餓、精疲力竭、警察的暴行。這表明了事實不僅僅



此圖為隔離解除後，來自印度農村的移工居住在海得拉巴城市空間的情況。他們住在路邊或棚戶區、在建築工地工作，同時也從事傳統石磨產業。

來源：Rafia Kazim。

是經濟上的不安全，移工擔心他們的心理和社會安全。

一想到要死在 *pardes* ——外地／異鄉，對移工來說這是心理上難以忍受的事情。一些移工說到，如果他們要死他們寧可死在「家裡」也不願死在城市裡。用 Arjun Appadurai 的話是這麼說的：「虛弱及不足的人類」（*infirm and insufficient humans*），這確實使這些人深深地害怕死去時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哀悼。

> 結論

印度移工沒有集體發言權，使他們失去了強大的議價能力。他們的工資在全球標準看來是倒數第一，而他們大多數人是靠著每天微薄的收入生存。

政府當下該做的，應是為移工訂定全面的計劃。此外，還應該讓移民工人進行官方登記，並替他們建立一個數據庫。政府須要對國內城鄉的貧困人口保持敏感度，並引入和實施以村莊為中心的計劃來優先振興印度農村。移工的生命也很重要！■

來信寄至：

Rafia Kazim <rafiakazim@gmail.com>

> 全球化脈絡下的非正式及不穩定工作

Chris Tilly, 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 美國, ISA研究委員會, 包括社會工作(RC30)、勞工運動(RC44)、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RC47)



「沒有勞動合約，也沒有體面的待遇，我的工作是无形的。」2018年，墨西哥城，家務勞動工人抗議。
來源：Georgina Rojas-García。

學者 Akua Britwum 回應國際勞工組織(ILO)官方所做的關於不穩定工作的報告道：「你們所謂的不穩定工作聽起來就像在加納我們稱作為...的工作。」多年以後，另一位 ILO 成員對我提出：「德國工人所抱怨的那種不穩定工作，韓國工人求之不得。而韓國工人所抱怨的那種非正式工作，北非工人求之不得。」

非正式工作是一種自身合法但卻遠達不到或遠抓不到標準就業法的有償工作。所謂「遠達不到」(beyond the reach)是指工作沒有被那些法律所涵蓋。自顧工人如街邊小販，還有許多被僱的——比如家政工人、農業工人和臨時工人——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也都算作是非正式的。而「遠抓不到」(beyond the grasp)是指在理論上法律應用，但在實踐上卻沒有被執行。這包括許多較小企業——比如小型零售商店及餐廳——但也包括一些非常大的企業中的工人。非正式就業尤其不限於受非正式的、賬外生意所顧的人員。比如在墨西哥，大多數非正式工人在正式的企業中工作。雖然非正式工作被視為對全球北方許多人興趣有限的邊緣現象，世界上多數的工人仍非正式地勞動，因此是時候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這些不正式工作以及如何得到改善的問題上了。

> 不穩定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相對性

不穩定工作和非正式工作都是被相對地定義的術語，因此有必要把它們放到國家的脈絡下來看。十年前的一場會議中，我聽到加納的勞工

那麼這有何新奇的呢？非正式和不穩定並不是新的概念。事實上，早先馬克思與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所描述的工廠工人聽起來很明顯地像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非正式工作那樣。這並不是說過去所有工作都是非正式的。世界上多數的工作是在一種勞動不自由的形式中進行的，而後者被一系列詳細定制的規則——如動產奴隸制、契約勞工、勞逸、佃農等等——所統治。因此更精確地來說是，在馬克思的時代裡，不穩定及非正式工作的新形式已經升起並發展。

有鑑於此，非正式和不穩定的工作從來沒有消失。舉例來說，日本盛行的終生僱傭模式往往只涵蓋了少數的工人，其中不包括女性、年輕及年長者、以及移民。即便在處於正式勞動的「黃金時代」的1950至1960年之間的北歐和美國或其它前英國殖民地，仍然有許多人從事非正式的和不安定的工作。這幾乎應用到所有的女性、年輕工人和移民中。這些移民包括跨境的和國內的移民：在我的國家即美國，那幾十年來最大的移民群體是從南遷向北的六百萬在地出生的黑人，然而透過入美墨西哥短期合同工作計成立的二十二年裡也引進了多達四百六十萬的墨西哥工人簽訂勞動合同。

>>



2011年，Myrtle Witbooi 在國際家政工人聯合會活動中演講。Witbooi 是一名南非家政工人運動的領袖，曾從事家務勞動，目前擔任聯合會主席。
來源：IDWF。

新奇之處在於，對於1848年來說新的現象如今以其它的方式重複了——非正式的和不穩定的工作正向著過去沒有發現的地方和人群蔓延。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非正式的和不穩定的工作是根據某些「標準」形式的就業而被相對地定義的。然而要是那些「標準」的就業異常地不再那麼「標準」的時候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在僱傭了大部分勞動力（在印度超過90%）的全球南方尤為緊迫。在此真正的問題並非概念而是實踐性的：我們如何捍衛因非正式化和不穩定化而降低的工作質量？

> 由不穩定的工人組織

解答的一個關鍵部分在於讓涉及其中的工人來組織。馬克思時代的非正式工人是有確定地組織起來的，並且在某些情況下成立了一隻持續到今天的工會。而如今的不穩定和非正式工人同樣組織起來，在合法的地方組建工會，還有協會、合作社或其它團體。事實上，這些工人近年來已取得一些全球工人階級最偉大的勝利：比如 ILO 正式通過第189號公約承認了家庭工人的權利，或者印度最近的法律合法化了街頭販賣。

不穩定非正式工人的組織方式有三件特別與眾不同的點。第一，他們與資本的關係往往很複雜。工人的真正顧者能夠被層層的轉包所掩蓋，或者工人可能主要是被勢力龐大的供應商或中間商所剝削。在這些情況中大都具有相對較小的結構性經濟槓桿作用——罷工在此可能不是一種有效的策略。且在很多情況下，政府都捲入非正式工人的剝削，比如美國政府制定了入美墨西哥短期合同工作計劃制定條款，或者警察騷擾或勒索街頭小販。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不穩定和非正式的工人往往以國家作為迫切要求福利及保護的對象。

第二，最集中從事非正式和不穩定工作的群體同時是以其它不同方式被邊緣化的群體，尤其女性、從屬的種族或族裔群體，還有移民。因此，他們像圍繞其建立在工作上的身份認同一樣圍繞著上述這些身份認同進行著組織。

最後，他們尋求國家代表他們的利益行動，以及他們具有多樣和交叉身份認同的事實意味著這些工人群體往往通過建立聯盟來建立權力——比如女性運動、移民權利運動、族裔倡導組織及工會。■

來信寄至：

Chris Tilly <tilly@luskin.ucla.edu>



美國全國日間工作者聯合陣線（NDLON）協同執行主任 Pablo Alvarado（最左）與日間工作者和倡議支持者，於帕薩迪納（加州）社區就業中心（NDLON附屬機構），2017年。
來源：帕薩迪納社區就業中心。

> 奧地利、德國、瑞士的照護爭議

Brigitte Aulenbach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奧地利, 經濟與社會 (RC02)、貧窮及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 (RC19)、工作社會學 (RC30)、女性及性別與社會 (RC32) 等研究委員會成員; **Helma Lutz**, Goethe University, 德國, 女性及性別與社會 (RC32)、傳記與社會 (RC38) 等研究委員會成員; 同時為種族主義、國族主義、原住性與族群 (RC05) 研究委員會主席; **Veronika Priel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奧地利, 貧窮及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 (RC19)、女性及性別與社會 (RC32) 研究委員會成員; **Aranka Vanessa Benazha**, Goethe University, 德國; **Karin Schwiter**, **Jennifer Steiner**, University of Zurich, 瑞士

來源: Eva Langhans°



20

> 老年居家照護: 新的照護市場和不穩定的移工

與 其他許多國家一樣, 奧地利、德國和瑞士將面臨越來越多所謂的「照護缺口」。隨著人口逐漸老化, 家庭內部的非正式照護能力也跟著下降, 這是因為福利國家根據現今主要的成人工作模式重新進行了調整。與此同時, 國家取消了越來越多的社會服務——尤其是在長期的老年照護上。這導致了跨國家庭照護仲介所籌劃的營利性市場開始出現: 照護工作外包給來自中歐和東歐等新歐盟成員國的循環式移民, 而這些移民絕大部分都是女性。這些照護工作者會住在老年人的私人住宅中照顧他們, 並與他們一起生活數週或數月 (居家看護, live-in care)。在這個競爭激烈且

快速成長的看護市場中, 仲介機構的角色影響力越來越大。儘管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使以前的非正規部門正規化, 但這並沒有明顯地改善看護的工作條件: 居家看護人員通常需要24小時待命, 而且他們的薪資遠遠低於當地的薪資水平。儘管在這三個國家當中, 居家看護都被視為是一種非常不穩定的新興產業, 但其具有差異性的規定仍給予了公眾辯論和批評的機會。

> 奧地利: 自僱下的照護人員

在奧地利, 居家看護被列為一種自僱性行業。因此, 工作時間或工資等規定不適用於看護人員。這種規定對於奧地利這個福利國家和每一戶人家來說, 是一種有彈性又相對便宜的解決

>>

方案。儘管如此，這種自僱模式仍然存在著爭議。反對者認為（與這些參與獨立市場的看護工作者所想的相同），機構嚴重地影響到了勞動條件。例如，機構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夠決定工作的出價和薪資。因此，這些自我組織的護理工作者們倡議要求廢除他們認為是虛假的自僱工作。機構和商會們（他們正式代表了機構和工人）呼籲要進一步讓現有的制度更加專業、有規範。機構可以自發適用的奧地利ÖQZ-24協定被視為是機構遊說下的成果之一。這份協定試圖重塑市場競爭，有利於機構去建立最低的照護門檻。由於協定的目的在於提高照護的品質，而不是工作的品質，因此大多只是間接地影響勞動條件，而不是將其視為問題本身看待。近年來，工會和照護人員為改善勞動條件而進行的鬥爭愈演愈烈，但迄今沒有對照護工作帶來太大的改變。

> 德國：派駐照護人員

在德國，除了普遍適用的法律外，並沒有任何針對居家看護員的具體規範，這樣的情況正反映在機構所涉及的眾多法律框架之中。大多數機構採用派遣模式：護理人員受僱於派遣國的機構，而這些機構需要支付他們社會安全補助金。還有一點是，這些機構必須遵守德國的基本勞動條件規範（例如最低工資和最長工作時間），但其實這些規範常常都會被規避掉。而這份照護工作的跨國性質和在私人住家工作等因素，也使得照護人員的勞動條件難以被確保。此外，工會代表和其他的利益相關者也都批評了實際施行保護規範的難度，以及隨後工人會缺乏社會保護的問題。實現法律的安定性也是看護產業的核心目標——這以商業利益協會VHBP 作為代表。此外，各機構也努力成為長期照護部門當中受德國官方公認的新支柱，為他們的利益保障爭取立法。從這點可以解釋為，他們正嘗試從基層制度化整個部門。對於照護人員而言，社群媒體已成為溝通和非正式知識交流的重要工具——但迄今為止，德國的政治自我組織仍處於起步階段。

> 瑞士：身為受雇者的的照護人員

在瑞士，居家看護是一種正式的僱傭關係。只有總部設在瑞士的機構才能派遣照護人員給私人住家（派遣員工），或是由仲介安排照護人

員直接受哪一戶人家雇用（定職員工）。與奧地利和德國不同，瑞士的法律禁止自僱或派駐照護人員。此外，居家看護尚未被制度化為支撐長期照護體系中的支柱之一。國家的所給予的財政支援也只僅限於（醫療的）護理服務。因此，人們必須自掏腰包支付居家看護的費用。在勞動法方面，在私人住家工作的場合並不受《聯邦工作法》的約束。這意味著居家看護者在最長工時或夜間工作上等情況，無法享受到與其他工人相同的保護。雖然他們所適用的法律規定了最低時薪，但由於他們要24小時待命的職責並沒有受到規範，使得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沒有什麼效果。近年來，監管部門和媒體一直在爭論，該行業不穩定的工作條件已成了一個問題。與其他兩個國家相比，瑞士的（自）組織和工會化的看護人員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 結論：居家看護本質上是一種充滿困難的模式

最後比較這三個國家，我們發現——尤其是在德國和奧地利——仲介機構及其組織已經成為了能夠形塑規範的強大涉入者，而在這個時候我們仍聽不見移工的聲音。在瑞士的案例中，居家看護作為一種正規化的僱傭關係，正助長了工人和工會代表的基層組織，引起了公眾的關注。

儘管存在這些差異，居家看護的模式在本質上是建立在這三個國家的循環式移工，其高度不穩定的工作條件之上。此外，這種模式也減少了中歐和東歐可取得的照護資源。在這些見解之下我們必須警告，切勿再藉由制度化居家看護的方式來支撐長期照護制度。這只是一種剝削性的應急方式。若想要持續地解決「護理缺口」的問題，須要從根本重新評估照護工作，讓收入足以在當地生活的通勤勞工也能夠提供高齡照護。■

來信寄至：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Helma Lutz <lutz@soz.uni-frankfurt.de>

Karin Schwiter <karin.schwiter@geo.uzh.ch>

> 數位時代下工作的未來

Ruth Castel-Branco、Sarah Cook、Hannah Dawson，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南非，以及 Edward Webster，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ISA勞工運動委員會(RC44)前任主席



2020年3月於南非約翰內斯堡，校園廣場中快遞員的非正式工作區。
來源：Fikile Masikane。

許多人宣稱，數位勞動平台的崛起正在改變工作的未來。雖然一些人稱讚「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遠程執行、以網路為主的工作(「群眾工作」)和在特定區域進行、以地域為主的工作——所帶來的自由和靈活性，研究卻發現，平台經濟正使雇用臨時工制加劇，並將健康、安全等職業風險轉嫁到勞動者身上。

許多討論都預設數位平台正在創造「新的」工作種類。然而，這些工作絕大多數都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計程車、餐廳外送服務和家庭清潔工。那麼，這些新興的零工類工作哪裡「新」呢？數位平台又是如何改變正式與非正式勞工的含義？

> 南方世界的平台工作有什麼「新」的？

在南方世界的經濟體中，最大的特點可能是高度的非正式性。在「新」形式零工工作所發生的環境中，非正式工作關係已經成為常態而非例外了。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關於數位平台勞動力的報告指出，以非洲為例，超過80%的人口主要倚靠非正式工作謀生。

非正式工作關係的定義，一直以來都是透過與正式工作比較而來——例如，臨時而非常規的工作、書面和標準合約的缺乏、沒有社會福利

或保護，以及缺乏集體性組織和代表。實務上，非正式工作所涉及的各種活動，其特徵為多樣化的就業安排。Chen¹將這些人歸類為掌握生產手段、自主經營、直接向市場銷售商品的自營工作者；嵌入僱傭關係中的自營工作者，偽裝成商業關係；另一類則是僱傭勞工，由於雇主逃避而被排除在勞動和社會保護之外。性別、種族、其他結構性等級制度因素，通常反映在這些類別中：因此，男性傾向於主導收入較高、陷入貧困風險較低的自營工作，而女性則集中在低收入的活動。

平台工作重現了很多非正式的特徵。從事平台工作者很容易被錯誤地歸類為「獨立」承包商，因此無法獲得給薪休假、福利(包括產假福利)、社會保障或職業及健康保險。然而，他們在卻經濟上「依賴」平台，對應用程式幾乎沒有任何控制權。確實，如 Webster 和 Masikane²所呈現的，員工受制於應用程式的「權威型演算法管理」，它可以分配任務、追蹤績效、決定薪資，甚至可以單方面終止僱傭關係。

以地域為主的工作(例如外送)主要由年輕男性從事，特點是工時長、需要面對面的接觸。雖然薪水低，所得還是比其他替代方案好；且因為需求和供應皆源自當地，更有利於勞動者的集體組織。相比之下，以網路為主的工作(例如編輯)由南方世界的隱形工人所承擔，其客戶則多數來

>>

自北方世界。由於工時短且靈活的特點，這類工作更多的是吸引必須兼顧生產（物品）和生育的女性。

數位平台雖然多樣化，卻也高度集中：前述的 ILO 2021年報告顯示，由數位平台所產生的收入當中，有70%來自美國和中國。雖然這可能會損害全國的中小企業，但它也創造了新的權力來源。在南非豪登省，Uber Eats 外送員正在籌措混合型組織，它起源於全國性的離散互助協會，但如今已發展成區域性的網絡。他們透過 WhatsApp 連結彼此，開創了一系列的數位直接行動，包括以集體登出的方式達成罷工。同時在哥倫比亞，Rappi 的外送員在 NGO 和中央總工會的支持下，開發了一款工會應用程式：UNIDAPP，並成功參與了一場針對跨國平台的跨國直接行動。³在烏干達，合併運輸和勞工工會支持開發了一款為 Boda-boda 司機設計的應用程式，大幅地擴張了它的成員，並改善了司機的工作條件。

雖然對非正式經濟的介入通常僅針對企業發展，ILO 第204號公約卻強調了一股不斷提升的共識，亦即這些介入必須將得來不易的勞動和社會保護，擴展到非正式勞工身上。在英國，最高法院裁定 Uber 司機有權享有給薪休假、最低工資和養老津貼。在南非，競爭委員會也針對平台對中小企業影響展開調查。

> 未來會怎樣？

兩條廣泛的途徑可以確定：外資科技巨頭支配地位的深化，且無論在國內或全球都尚未決定如何運作。這會創造一些非正式工作，但勞動者也將被困在低薪的苦差事中，無法得到正式就業的保障和福利。由於利潤和稅收保留在國外，這可以被視為是重新殖民南方世界的一種形式。

另一種途徑可以是「數位社會契約」，由平台工作人員和其組織積極參與下所創造。這將涉及全球和國家政策的連貫性，包括立法保護這類勞動者。這種樂觀的途徑，開啟了將勞動和社會保護擴展到非正式勞工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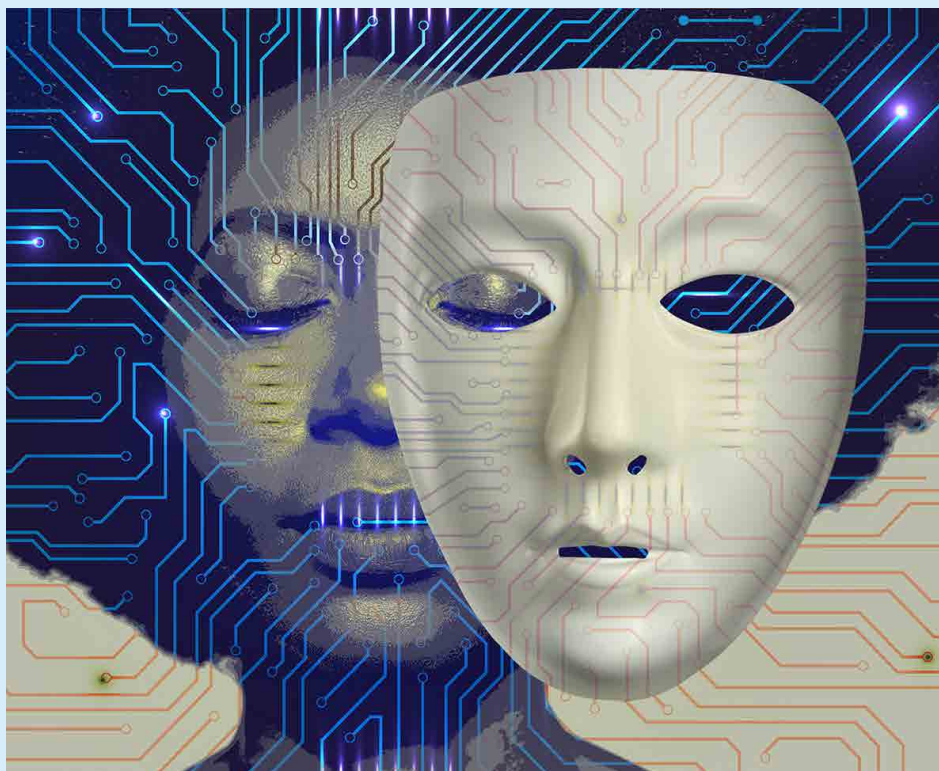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Ruth Castel-Branco <Ruth.Castel-Branco@wits.ac.za>

1. Chen, M. (2012) 〈非正式經濟：定義、理論和政策〉，WIEGO Working Paper，卷一。
2. Webster, E 和 F. Masikane (2020) 〈我只想活下去：以約翰尼斯堡的食品外送員為例〉，Southern Centre for Inequality Studies。
3. Velez, V. (2020)〈這不是童話故事：獨角獸與哥倫比亞對零工勞工的社會保護〉，SCIS Working Paper，卷七。

> 破解演算法控制

Sandiswa Mapukata 和 Shafee Verachia,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以及 Edward Webster,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和 ISA 勞工運動委員會(RC44)前主席



| Arbu 繪。

正義聯盟是一群超級英雄，成員包括（但不限於）蝙蝠俠和神力女超人，他們試圖從超級反派達克賽德手中拯救虛構的世界。[演算法正義聯盟](#) (Algorithmic Justice League, AJL) 成立於 2016 年，同樣追求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世界，尤其在如何使用人工智慧。AJL 著重於提倡對抗演算法控制的四項關鍵原則，亦即積極同意、有意義的公開透明、持續監督和可課責性，以及能被起訴的批評。

雖然被貼上了「人工智慧」的標籤，但它絕不是人造的；正如 Kate Crawford 在《AI 圖鑑 (The Atlas of AI)》中所說，「AI 既是具體的，也是物質的。」正是人工智慧的這種物質性，對勞動者的控制才得以浮現，我們把這種控制的形式定義為演算法控制。在本文中，我們將演算法控制概念化，並探討它如何影響勞動者，以及他們如何開始抵抗。總結時將會針對勞動者主導的抵抗提出一些建議。

> 什麼是演算法？

在世界各地，許多種利害關係人（包括政府、學者和運動者）都在設法對付演算法控制的系統，是如何重塑世界。演算法的存在是無形的，儘管它的存在和使用會產生物質性的後果。演算法是一套程序／需要被遵守的指令，用以計算或其他解決問題的操作，尤其是透過電腦。如雲端運算這種技術的崛起，使透過網路（如亞馬遜網路服務）提供計算服務成為可能，也使組織和企業得以自動化某些營運層面。有些人認為演算法是中性的。然而，愈來愈多工作（參見 Ruha Benjamin《技術後的種族》）展示演算法由於被人類程式設計師編碼、實務操作時的依據來自一組規範和指令，因此也可以存在偏見和歧視。如果偏見被餵進演算法中，演算法就會將現有的歧視模式自動化。這點在現今的生態、由白人男性經營的大型科技公司的中尤其如此。Safiya Noble 在她《壓迫的演算法》書中，探討了 Google 的演算法如何歧視性地針對黑人婦女和女孩。

>>

> 演算法控制——現實

演算法深入控制工作的程度，更甚於工業化歷史上任何時候。透過在勞動過程的核心引進演算法，建立了它的控制和獲利最大化。這是馬克思所說「命令的增值 (valorization in command)」的一個例子。這些演算法被用來計算勞動者完成工作的速度。如果平台工作者的工作表現，沒有達到演算法的標準，管理階層有權力立即修改勞動者賺取的報酬和/或將他們解僱（停用或中斷他們的帳戶）。2020年12月，南非約翰尼斯堡的 Uber 司機發起抗議，手段為刪除 Uber 應用程式、不接受乘車請求。這些司機的訴求包括：他們的帳戶被 Uber 封鎖的過程模糊且不公開，以及司機賺取的費用多寡由 Uber 單方面決定並實施。

在《工作的 Uber 化 (The Uberisation of Work)》一文中，Edward Webster 認為對於像 Uber 這樣的公司來說，演算法使他們得以專注於高附加價值活動，同時透過技術的支持來實現外包和分包，進而脫離主流就業市場中，雇主需要承擔的責任。這些公司展現了壟斷的傾向，同時得以繞過一般的公司治理和就業模式。

> 演算法控制 - 反抗

雖然演算法控制看似難以克服，雇員們自己卻也正在使用演算法來爭取控制自身的工作條件。經過談判，西班牙通過了騎士法，認可了外送騎士們是數位平台的僱員。此外，數位平台必須對其演算法如何影響工作條件保持透明。在討論

演算法控制及針對演算法的反抗時，消費者的角色也十分重要。藉由演算法對個人資料的挖掘，消費者也成了價值生產者。科技巨頭的消費者在使用各種平台時，也可說是在進行著無償的勞動。這使消費者的地位更接近於勞動者，而不是科技巨頭公司的經理。

在分析這些對科技巨頭演算法控制所進行的反抗時，研究者還必須考慮空間的重要性。演算法控制系統在不同空間脈絡下具有特殊性。考量這些差異、超越國家層次，是很重要的。有鑑於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之間持續存在的不平等，這兩種脈絡都能提供重要的特殊性，可以強化抵制各種形式的演算法控制的對話。這在我們思考如何制定勞動者優先而非企業優先的未來工作概念時，將會至關重要。Cathy O'Neil 在《當數學成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中寫到：

「大數據流程編纂過去。它們不會發明未來。發明未來需要道德想像力，而這是只有人類才能提供的。我們必須明確地將更好的價值嵌入我們的演算法中，創造遵循我們道德準則的大數據模型。有時這意味著將公平置於利潤之上。」■

來信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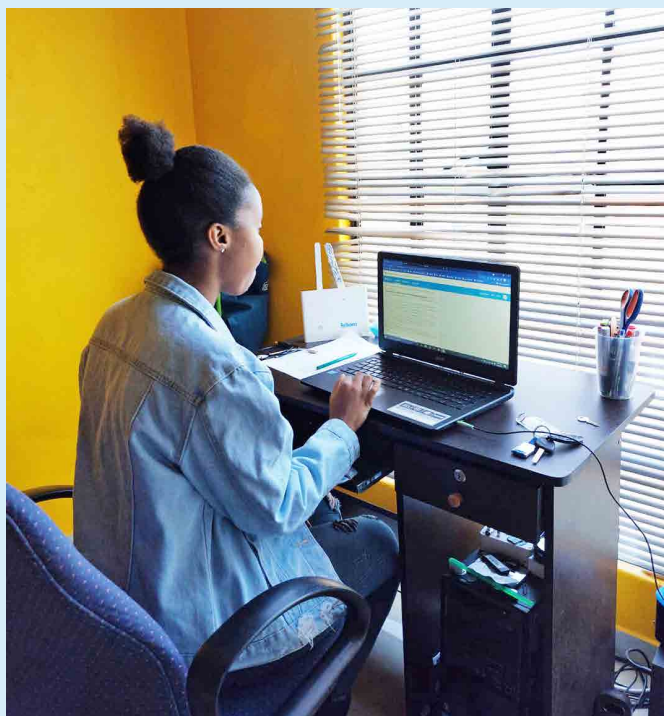
Sandiswa Mapukata <sandiswa.mapukata@wits.ac.za>

Shafee Verachia <mohammed.verachia@wits.ac.za>

Edward Webster <Edward.Webster@wits.ac.za>

> 線上勞動平台： 無法被制衡的權力？

Kelle Howson,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國, Patrick Feuerstein, 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德國, Funda Ustek-Spilda,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國, Alessio Bertolini,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國, Hannah John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美國, 以及 Mark Graham, Oxford University, 英國



線上零工工作者或「雲端工人」藉由平臺與客戶聯絡，而平台則從交易中抽取佣金，並通常對於勞動過程有高度控制。

來源：Fairwork Project

COVID-19 大流行使知識工作者遠距工作廣泛地成為常態，伴隨數位工具的進步促進這種轉變，包括通訊、視訊會議、演算法管理和工作分配，乃至於對勞動者的監控。正當大流行使人們更加關注並加劇了勞動市場中許多先前便存在的不平等現象時，一個明顯的區別逐漸浮現：那些能夠輕鬆轉換為遠距工作的職業、無法透過遠距完成的低薪服務類工作、那些面臨接觸病毒雙重風險的勞動者、隔離期間的收入損失。

雖然這些不公平的勞動市場分層——具有遠距工作能力的人和必須親自完成工作的人——自從大流行開始以後可能變得更加嚴峻，但較少被討論到的，卻是並非所有遠距工作者都得以享有相對的安全。事實上，從 COVID-19 出現以來，線上零工經濟可說是蓬勃發展。然而當這種形式的勞動為許多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便利時，它們的處境卻依然不那麼為人所熟知。

> 雲端工作的勞動控制

線上零工工作，與「受地域限制」的零工工作如叫車、送餐和清潔（較為人所知的例子是 Uber、滴滴出行、戶戶送），有著清晰的共同特徵。線上零工或「雲端工作者」透過平台介面與客戶聯繫，這會從每筆交易中抽取租金，且通常對勞動過程施以高度控制。平台控制了工作如何被完成，包括透過演算法管理進行任務分配、支付和紀律處分等。就像他們從事受地域限制工作的同行一樣，合約將這些勞動者劃分為獨立承包商或自僱者，從而將他們排除於多數司法管轄範圍的重要就業保護之外，如最低薪資、病假給薪、育嬰假和退休金。

然而，和計程車、外送和清潔部門的同行們不同，以雲端工作平台作為媒介的工作，理論上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透過網路連線執行。它們促進了一個複雜的跨邊界聯繫網絡，並已被理論化，足以創造一個全球規模的勞動市場。這種動態為勞動者創造了嶄新的機會，但它同時也增加了漏洞，以特定的方式使勞動者陷於風險之中。

>>

首先，平台在無數個司法管轄範圍間不斷調解勞資關係，這使得它們難以被規範限縮。他們擁有非常少的固定資產，並與勞動者保持合約的距離。這種流動性和短暫性意味著他們可以逃避保護勞動者和大眾的地方立法，以及稅收和競爭制度。

同樣的動態也有助於壓抑勞動者的結構性權力。當勞動者是孤立的、地理上分散的，並基於平台的設計而相互競爭時，他們就很難進行組織、團結並採取集體行動來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將促進集體談判的國家管理框架套用在全球線上勞工平台上也十分困難。雲端工作缺乏正式的勞工結構和公共問責，這給予了平台巨大的權力來決定條款、塑造工作條件，並在最終按照自己的意願，負責任或不負責任地行事。

大多數雲端工作平台的加入門檻比一般就業低。這可以為那些被不公平地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的人，提供一個急需的機會——如南方世界的勞動者、承擔較高照護和家務職責的人（主要是女性）、移民工人、少數民族社群和障礙人士。然而，多數國際雲端工作平台都引進了過多的勞動力。這有助於客戶快速輕鬆地找到勞工，但也意味著勞工的工作機會和薪資受到抑制，因為他們正為了數量有限的工作進行激烈競爭，且競爭還逐漸增加中。

在任務以極短期為主的雲端工作平台，又稱為「微任務」平台（如 Microworkers、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和 Appen），勞動者可能會參與更大的項目，例如對數據進行分類和標記，以訓練機器的學習系統。這種大項目被分解成數個極微小的任務，可能只要幾秒鐘就能完成。在這裡，來自幾十個國家的數百名工人在很短的時間內為一個客戶完成一個項目。這種極微小的外包，可以完全模糊化最終產品所需的勞動條件，進而造成雲端工作的隱形，並侵蝕了勞動者的權力，特別是因為個別勞動者很容易被解僱和替換。

由於雲端工作者很難發揮集體力量，而且他們通常不受國家層級立法的保護，因此他們的日常工作條件仍然不穩定且充滿風險。大多數雲端工作平台允許客戶拒絕勞動者可能已經完成的

工作，有效地允許了不付款的發生。平台可能讓勞動者有能力對抗被拒絕，但這是可以斟酌的，通常涉及艱苦的自動化流程，這比完成另一項工作需要更多時間，且因為他們擁有的勞動者比客戶多得多，所以平台通常站在客戶的一邊。

線上勞動平台的勞動者也面臨著健康和安全風險，包括暴露於具象的或心理上令人感到不適的內容，以及他們的隱私風險，或數據保護措施的不足。

最後，勞動者很容易受到客戶歧視，包括基於性別、種族或地理位置相關的預設或偏見，所引發的歧視。

> 保護雲端工作者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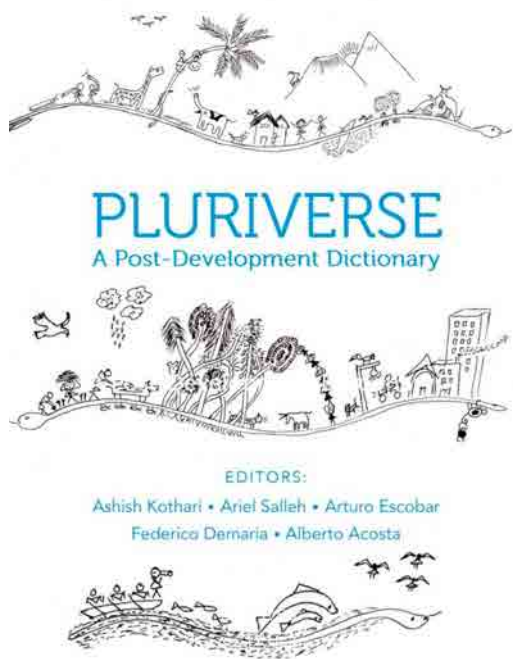
在缺乏能夠馴服平台權力的國家或國際監管方法，進而造成勞工組織和集體談判的障礙之下，遠端零工工作條件的風險和剝削激增。COVID-19 大流行使沒有安全感的勞動者紛紛湧向遠端工作和線上勞動平台，因此更需要基層勞工力量和政策解決方案來保護這類勞動者。公平工作項目（The Fairwork Project）與勞工和專家共同制定了一系列公平雲端工作原則，作為這些努力的基準和參照點。這些原則涵蓋了上述各方面的風險和傷害，分為公平給薪、公平條件、公平合約、公平管理和公平代表等類別。我們根據這些原則對17個著名平台進行了評估（評分），以呈現目前線上零工經濟中勞工實踐的範圍。雖然少數平台獲得了相對正面的評估，最終我們的研究發現，基於問責的缺乏，平台不斷做出對數百萬勞動者的福利和生計產生影響的選擇（經常是負面的），所需的只是一行簡單的代碼。第一個公平工作針對雲端工作的評分，志在凸顯這些嚴重不平衡的權力關係，並透過未來的年度評分機制，我們希望一同努力，為遠端零工工作者帶來更公平的未來。■

來信寄至：

Kelle Howson <kelle.howson@oii.ox.ac.uk>

> Holding 作為勞動與認識論

Ariel Salleh, 訪問教授, Nelson Mandela University, 南非, ISA終身會員



《多重世界：後發展意義下的詞典》，Tulika Book (2019)。

歐洲中心主義對於「支配自然」的幻想一直是一種有問題的本體論。而物質和母體(mater, 拉丁語)之間的原初連結並不是巧合。早期的生態女權主義者將支配的文明驅力視為一種弑母的昇華，讓男人能在文化上生產，而不依賴神秘的自然流向。今天，這種將自然外化的心理分離使新自由主義權力、戰爭和現代科學得以實現。學術界中的戀母情結能否接受這一點？

> 重憶

在任何情況下，當代表「他者」的古老文化建立了一個物體和抽象化的世界時，它的鏡像仍然是感性的，可以被稱之為「Holding」。Holding指向人類與自然界新陳代謝的鑲嵌；它映照了在母親的懷抱中型塑自我的最初時刻。當人們能夠感覺到自我與自然的鑲嵌，正如新唯物主義者喜歡說的那樣，他們很容易理解所有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糾纏在一起」的。然而，我並不被這種說法所吸引；相反，我認為 Holding 是一種勞動形式，是繁衍性的，而不同於生產性的。審慎的

Holding為生物物理過程提供了能量，比如對孩童的照護或原住民對林地的保護。Holding傳授的是一種既草根又具系統性的認識論。

在我們編輯的文選《Pluriverse》(2019)中，Karin Amimoto Ingersoll 描述了夏威夷漁民的這種感知能力：

「一種關於海洋、風、潮汐、海流、沙、海草、魚、鳥和天體等非工具導向的知識，作為一個互相連結的系統，允許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在世界中移動……在這種海洋知識中，身體和海洋景觀在一種複雜的對話中互動……作為使我們與『自我』分離的，西方思想世界宏觀敘事的替代……因此，觀看成為一個政治過程，是對我們從海洋時序和宇宙中所學習的所有記憶與知識的解讀，但它們已被認同、地方和權力的僵化殖民結構所抹去……(太多的)世界沒有記憶的深度，彷彿我們所居住的宇宙是空白的地貌，因此可以消費和發展……」

> 價值再生

正如《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述，基督教父權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歷史性的鑲嵌框架。隨著全球企業和多邊機構的崛起，照顧者、小地主和原住民的他者化知識被貶抑為「文化的」，而不是「經濟的」。這使得他們敏銳且永續的生產方式在白人產階級男性的論述中被忽略，而同時政治上的右派和左派也都認為勞動必須是「生產性的」。也就是說，「真正的工作」是將物質轉化為「人造的」物品，從而具有「價值」。甚至進步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例如綠色新政支持者，和政治經濟學家也從量化方法上爭取將照護工作重新放置在正規經濟的位置。與馬克思主義的使用與交換二元論不同，生殖或「新陳代謝」的價值不需要衡量，它是隨著生態系統的繁榮和人的身體發展而經驗的。

在沒有剝削、開發主義、生物多樣性喪失、用水高峰和氣候變遷的情況下，有很多方法可以滿

>>

足社會需求。自1999年西雅圖人民核心小組以來，資本主義父權帝國已經受到了世界社會論壇、農民之路、原住民環境網絡、世界女性大遊行和反抗滅絕等運動的挑戰。這些倡議從 Ivan Illich 和 Wolfgang Sachs 這樣的反殖民主義思想家，以及 Maria Mies 和 Vandana Shiva 這些生態女性主義者那裡得到了靈感，他們對「不良發展」進行了強而有力的批判。2019年多重世界(Pluriverse)計畫，在安第斯山脈的美好生活(buen vivir)倡議者、印度的自治(swaraj)社區、歐洲的去增長運動者以及其他一些人們之間，開啟了一個跨文化的交流，並呼籲「全球就是在地」。轉述自 Manfred Max-Neef 所說：「小型自我管理的經濟體是『協同的』，同時滿足許多需求——生態再生、日常生計、學習、創新、認同和歸屬感。」

> 結構性相似

家庭主婦和農民在鄰里和村莊阻止殺蟲劑的使用或採礦，這些持家勞動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這些工人也注意到自然與婦女、原住民身體的商品化之間的結構性相似之處。在世界性的運動中，全球北方婦女的政治選擇與全球南方種族化人民的選擇基本相同。要麼通過法律權利的公民機制獲得解放，要麼通過社區互惠獲得自我實現。

在二十一世紀，許多人正在採取重大的文明措施，將人性和自然重新結合起來。新水資源典範(New Water Paradigm)的整體科學或自然母親權利(Rights of Mother Nature)的人民法庭(Peoples' Tribunal)就是這種重憶的典型。糧食主權是北方和南方普遍活動的核心目標——但不要與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UNFAO)的「糧食安全」概念相混淆。後者只是帶來了更多的暴力，剝奪了生計，石油養殖的單一作物，以及污染性的跨洲自由貿易。主流的女權主義者，以及一些左翼運動者和綠黨人自信地談論著調整主流的資本主義典範。然而，國家權力往往以一種壓迫性的妥協形式來安撫善意的變革行動。這在循環經濟、綠色協議和地球系統治理中已經可以看見。

> 一個生物文明？

世界各地以「公平和永續分配」為名的社會產品雖然聽起來不錯，但卻沒有熱力學意義。正如 Jason Hickel 所指出的：為了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全球經濟將不得不增長到目前規模的175倍，因為它已經每年超出地球可承受度的50%。家計經濟是在與在地生產的公共性中，尊重自然界的物質限度。這種人民的典範達到了一個「生物文明」，以取代孤獨的高科技個人主義和疫病國家剝奪生命的公式。與「我思故我在」中分離的「思」(cogito)相比，南非的烏班圖(ubuntu)倫理的前提是「我在，因為你在」的Holding邏輯。相關的世界觀有美好生活、生態村、禮物經濟、共生(Kyosei)、感覺思考(Sentipensar)，現在正在彼此對話中，成為全球替代方案的織錦。

生態社會主義者能否「重新體現」他們的唯物主義，並考慮一個「他者化」勞動階級的歷史能動性，一個來自資本的國內與地理邊陲的「元產業」？在這裡，在理論的邊緣，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工人，他們滿足了所有階層的物質需求。事實上，他們甚至通過將人類—自然的新陳代謝結合在一起而使資本主義成為可能。這個全球階級不需要垂死的歐洲中心主義時代的嚴格抽象，主體超越客體、人性超越自然、男人超越女人、白人超越黑人、經濟超越生態。¹

來信寄至：

Ariel Salleh <arielsalleh7@gmail.com>

1. 此處文字改寫自2021年6月於巴黎的講座《Femmes, écologie et engagements politiques du Sud au Nord》。

譯註：Holding在本文中具有多重意涵，譯者認為以一個同一的詞彙將其翻譯至華語的脈絡是困難的，以此在本文中不多做翻譯。Holding 在文中具有「與自然鑲嵌」的意義，同時也可以理解成從基督教父權資本主義中「擁抱」、「維持」或「保護」某些事物，互為主體地在勞動過程中給予能量並使其不被破壞、永續發展的形式。

> 宮崎駿動畫：人類世的萬物有靈論

Shoko Yoneyama, University of Adelaide, 澳洲



《龍貓》(1988)。
來源：吉卜力工作室。

人們普遍認為，為了解決氣候變化、COVID-19以及其他與「人類世」相關的生存危機，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但我們還沒有取得很大的進展。也許我們需要設想一種完全不同的關係。Amitav Ghosh認為我們正在遭受想像力的危機，因為我們缺乏一個文化架構參考，使我們能夠想像另一種本體論。萬物有靈論是否有可能幫助找到一個解決方案？

但萬物有靈論不就是「原始人」的「簡單信仰」嗎？比如遠離現代的獵人？這就是萬物有靈論在西方正統觀念中的典型框架：它基本上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論。「新萬物有靈論」是最近的一個思想流派，它採取了一種更正面的觀點，將萬物有靈論作為對現代性的一種有利批判。然而，新萬物有靈論的全部承諾還沒有實現。在大多數情況下，萬物有靈論在西方大學內的人類學院所仍然處於標本式的地位。

> 宮崎駿動畫的全球流行

宮崎駿，吉卜力工作室的動畫電影導演，在激勵人們深刻地面對人類世生活中充滿挑戰性的現實上發揮了珍貴的影響。他的動漫作品中所呈現的萬物有靈，能夠打入數百萬觀眾的心靈，對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行積極的重新想像。宮崎駿的動畫片以極易理解的萬物有靈論的圖像和故事激發了我們的想像力。

「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幾年前，我在會議上發表論文提出同樣的觀點時，一位同事驚呼：「宮崎駿的動漫是小孩子的東西。我兒子五歲時就看了《龍貓》。」這是真的：宮崎駿的作品主要是為兒童創作的，但也由於他的電影，吉卜力的前聯合導演高畑勲說：「日本兒童只要看到樹就能感覺到龍貓這個樹精。」對全世界的兒童來說，這很可能是一種普遍的情況。自1996年迪士尼開始發行吉卜力電影以來，宮崎駿動畫的全球影響力成倍增長，《神隱少女》於2003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動畫獎，而且這些電影開始在 Netflix 和 HBO Max 上播放。

> 批判性的萬物有靈論

那麼，宮崎駿動畫在全球的流行與「人類世」有什麼關係？

宮崎駿動漫中的萬物有靈論的表現，特別是在他的標誌性電影中，如《風之谷》(1984年)、《龍貓》(1988年)、《魔法公主》(1997年)、《神隱少女》(2001年)和《崖上的波妞》(2008年)，使我們能夠更深入地重新想像人類與自然關係。

重新想像？日本的情況則不同，那裡的萬物有靈的本體論和認識論一直延續到今天，與現代性並行。在那裡，萬物有靈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此外，我認為，一種新的

>>



《魔法公主》(1997)中的木靈。
來源：吉卜力工作室。

萬物有靈論已經演化為對現代性消極層面的回應，並「強化」（如神奇寶貝的進化），形成對現代性的反身性批判。這就是我所說的「批判性萬物有靈論」或「後現代萬物有靈論」。

批判性萬物有靈論是從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工業污染案例之一的受害者，水俣病患者的敘事中演變而來的，自1950年代以來一直在持續。電影觀眾可能對 Johnny Depp 在2020年的電影《惡水真相》很熟悉，這部電影描述了攝影師 Eugene Smith 的生活，他拍攝了標誌性的照片「洗澡的上村智子」。

社會學家鶴見和子首先觀察到，這種關於萬物有靈論的草根語言是對現代性的批判。我在《當代日本的萬物有靈論》¹一書中對鶴見的「萬物有靈論計畫」進行了研究。我在書中研究了四位傑出日本知識份子的生命敘事，宮崎駿是其中之一，我並在書中探討這些創造性的思想家是如何提出「萬物有靈」可以拯救世界的想法。

宮崎駿堅持認為，需要萬物有靈論來拯救世界。因此，推廣萬物有靈論是他的生涯規劃。他作品的哲學基礎可以在《風之谷》的漫畫版中找到，這是一個超過一千頁的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史詩故事，他花了十二年時間才完成（1982-94）。

宮崎駿的（批判）萬物有靈論由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對被賦予能動性的，對於自然的美麗描繪。自然被呈現為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非二元組合，正如《魔法公主》中森林精靈 Kodama 所象徵的那樣。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地點和地方的意義，這使他的萬物有靈論有別於國家主導的日本萬物有靈論的意識形態和利己主義語言。他對萬物有靈論的定位為其與其他地方的萬物有靈論

鬆散地聯繫起來提供了可能性，以形成 Arif Dirlik 所說的「跨地方的聯盟」。第三是對二元論的否定，如人/自然、善/惡、生/死、精神/物質、看見/不被看見、光/暗等，這具有強大的理論意義。

宮崎駿的萬物有靈論在理論上是激進的，因為它挑戰了社會科學和現代性典範的既定前提，這些前提都是基於階級性的二元論：一、人類高於自然（人類中心主義）、二、理性高於精神（世俗主義）以及三、歐洲傳統高於其他的（歐洲中心主義）。換句話說，他的萬物有靈論顛覆了現有的典範。它提出了一個潛在的可能，在一個新的方向上激發我們的想像力，以設想一個不同的典範，能夠擺脫階級性的二元論。詳情請見我在《理論、文化與社會》上發表的論文[《宮崎駿的萬物有靈論與人類世》](#)。

有了這些理論意義，宮崎駿動畫的全球流行建構了一個顯著的社會學現象。如同龍貓在孩子們心中種下了樹的種子，宮崎駿將強大的萬物有靈論形象投射到數百萬觀眾的心中。宮崎駿作品的大規模流行，可能表明人們對他的萬物有靈論立場直覺的掌握或渴望。有可能在他的電影中，一個重新被施了魔法的世界使觀眾（包括社會科學家）對萬物有靈的認識論和本體論有了更多的認識，以一種糾正 Ghosh 想像力危機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宮崎駿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美的故事」，以應對人類世的「完美風暴」。■

來信寄至：

Shoko Yoneyama <shoko.yoneyama@adelaide.edu.au>

1. Yoneyama, S. (2019) *Anim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Voices for the Anthropocene from Post-Fukushima Japa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人類世及其爭議

Gaia Giuliani, 社會科學中心,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維德角。
來源: Gaia Giuliani。

近年來，將「人類世」視為一個概念、過程和現象已成為政治界、藝術界、文化界和學術界等領域之爭論核心。頗具爭議的是，其最主要的意涵指的是學者們認為第二、三次工業革命期間，地球因人為干預對地質、物理和生物組成所造成之重大影響。

> 對人類世理論的批判性觀點

在較具批判性的觀點中，「人類世」和有關於它的公開辯論有助於重新定義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現代性（根據這些批評，人類世是一現代事實）及從那時起開始享有特權的人類、非人類和無生命物之間的關係。這種概念重構發生於對權力結構的徹底反思，在行星尺度上控制有機和無機元素。

上述立場在反資本主義和去殖民觀點的交織上萌芽並深入其他學界，從全球反種族主義、女性主義、酷兒理論等跨學科領域的認識論，到

生物學、地理學、地質學和物理學甚至電影、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哲學、詩歌和表演藝術等領域。它們藉鑒了環境人文領域中的跨學科對話所發展出的兩個重要思想：一、環境也是一種社會現象；二、為了扭轉「人類世」對任何生物的劇烈影響，必須承認人類與地球上其他生物及無機組成物之間有具有政治意義的相互依存關係。

> 人類世的人類及其怪物化

這篇簡短的文章源自於這些批判性的反思，著重於人類世與想像、修辭和實踐的符號生產力有關之特徵，以及源自一個集體性的超驗主體（Foucault）並可以被定義的人類世的／在人類世中的人類的司法、政治和流行文化。

正如 Elisabeth Povinelli 所強調，此人類學涵蓋後殖民和去殖民主義批判中的笛卡爾主體以及社會契約論中的自由人，被女性主義學者認為與重塑世界的暴力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

現代性的突現有關。依附於這個人類學的是世界、歷史、地理和人性的願景——在符號學上構建身與心、人類與非人類、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非白人、好和壞、理性和非理性，世俗與宗教狂熱、對與錯、優與劣、拯救的和致命的作為分離的整體——自歐洲中心主義現代性的中世紀前提以來，就已強加了維持和複製資本主義及其暴力的本體論和邏輯。

藉由將人類世的邏輯和本體論與種族資本主義、父權制和殖民主義之間糾葛的理論與反思結合，我將探討歷史洪流下所產生的「怪物化」論述過程在構成人類世的「人」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以及在權力結構和價值提取中心創造霸權的「我群」做出的貢獻，這些都是源自於資本和殖民主義的現代性。此調查將揭示人類世本體論和其邏輯運作的跨時空合法性，並將通過道德恐慌之論述建構與殖民暴力、國家威權主義和致命的開發主義揭露怪物化過程與針對殖民叛亂者、逃亡奴隸、狼人、女巫、異教徒、暴亂農民、罷工工人及原住民抗爭等暴力之間的連結。

在我最近的著作《怪物、災難和人類世：後殖民批判》中，我通過對現代怪物和災難概念的後殖民調查來探索歐洲和西方對自然災害、大規模移民和恐怖主義的想像。在科幻、末日和恐怖電影、電視劇及新聞媒體轉載的圖像中，流行視覺文化的既定圖示有助於將現代恐懼的譜系追溯到人類世的本體論和邏輯。此書並沒有止步於揭示人類世的內在暴力，而是進一步提出一種女性主義、後發展和生態學的認識論，以及一個包含「新政治」概念的政策。

> 因應現今社會的女性主義政治路線

我建議可提出政策由相互依存照護、自我照護以及地球照護三面向來回應人類世的邏輯與本體論。我借用了西方現代女性主義中，照護的核心理論，也就是個人與群體的福利（生理、社會、文化、性別與經濟上）。儘管如此，照護問題還是可以通過酷兒、原住民、黑人和工人階級婦女理論的批評來解讀。借鑒 Sara Ahmed 和 Audre Lorde 的表述，我認為女性主義項目中的自我照顧概念可作為一個整合個人和集體自

治，並以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相互關懷為前提，而不是由父權、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性別角色構成。

人們居無定所、少數群體的去殖民和反父權鬥爭，以及在地和原住民族對抗環境災害與新殖民主義證券化所展現的復原力和抵抗力；在這樣的脈絡下，自我照顧意味著個人和群體的自主、自我保護和團結一致來反對國家的監視、規訓和虐待。這項政治項目包含相互依存的關懷、自我關懷和對地球的關懷，並將反威權與反殖民主義結合起來，以用來對抗開發主義、剝削和環境脆弱化。該項目基於理解使用城牆和邊境、社區警政和監獄群島、監視系統、監禁和強制移動這些手段的資本主義和父權制都是種族主義外，同時也知道種族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殖民性（Cedric J. Robinson、Ruth Gilmore、Laura Pulido）與地球的關係完全是建立於利潤導向上。

因此，這種反殖民基礎的政策必然是反開發主義的，並且基於地球上所有人類、非人類和無生命物都是相互依存的。

這樣的概念將地球關懷的問題推到檯面上，即反資本主義與地球上所有組成物之間的關係。借鑒庫德族 jineolojî 的原住民多重世界，政治運動的認識論，以及西方學者像是 Donna Haraway、Stacey Alaimo 以及 Karen Barad，這項計畫將照護的理念延伸至非人類的生命。唯有通過關懷、自我關懷和地球關懷的三位一體，人類對人類、非人類生命以及非生命的責任才成為了一種政治價值。

許多南方國家與原住民社群邊緣化了北方國家的住民，且全球各地的政治運動都體現了這樣的原則。只有一個地球激進的政策注意到人類世邏輯和本體論中的致命怪物，認知到以置位與不可或缺的多重性來回應，並可以主動地做出對比。■

來信寄至：

Gaia Giuliani <gaiagiuliani@ces.uc.pt>

> 帝國生活形式與 資本主義霸權

Ulrich Brand, University of Vienna, 奧地利, 以及 Markus Wissen,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德國



此為眾多案例的其中之一：全球北方的牛油果大量銷售，導致了全球南方的大量水資源流失。圖為南非的一種年輕、高密度的植物。
來源：Edrean 2013／創用CC。

批判性社會／社會科學式的思考，在處理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性、變遷與危機等主題上，有著深厚的理論傳統。相較於經常忽視問題根源的主流社會科學，批判理論的分析取徑則善於由社會關係的內在矛盾以及爭議性質切入問題。「帝國生活形式」¹的概念所強調的，是透過關注當代的重大挑戰——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全球化之間的關係——來理解歷史／現今社會中的矛盾。

如今已根深蒂固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在早期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中即佔據了主導地位，其是以全球規模的勞動、自然資源的過度取用為前提。這導致生態系統遭受破壞、生態匯的過度擴張、多國出現高失業率和失去平衡的勞動分工，為不穩定的勞工、婦女和未申請的移民帶來額外的負擔。

發展資本主義的特徵之一，是其需要從一個未發展／非資本主義的「外部」地區／社會來獲取原料和中間產品，並需要將自身的社會與生態負擔轉移至此地區，藉此來調節有償勞動和無薪

的照護工作。發展資本主義具有排他性，且是以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為運作前提。藉著在無數組織性的生產和消費行為，此種秩序得以被規範化，使得那些由此受益的人們得以忽視其帶來的暴力。

> 霸權

為社會與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卻又受到推崇的石化工業者，顯示出帝國的這套生產與生活模式已經取得了廣泛的認同——此即與Antonio Gramsci 所描述的霸權不謀而合。這套模式被銘刻在具宰制地位的論述（如「增長的需求」）與主觀意識（如「獲取更多」、「降低價格」）之中，且越來越受到數位化的趨勢助長；並為全球北方的許多人，以及少數全球南方的人們帶來了物質與財富、創造了利潤與工作。在其他地區，對勞動和自然的剝削，則是資本家與勞工在社會中妥協所帶來的現象；其同樣發生在全球北方的階級、父權、種族化社會中，社會與地域不平等的現象極度嚴重，甚至在近幾十年間不停加劇。

>>

在全球北方，食物、交通、電力、暖氣或電信等，各個領域的日常所需，皆在很大程度上倚賴著來自其他地區的物質流通、開採不同資源的工人、以及基礎設施運作下，由全球吸收的生態匯。全球北方的工人同樣依附於這樣的體系，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構成美好生活的要素，並且仰賴其提供生活所需。事實上，這些全球北方工人購買 Philip McMichael 說的便宜的「無中生有的食物」(food from nowhere)、開車或是使用燃燒石油所產生的電力照明，並不是他們個人的選擇。他們必須這麼做，只是為了養活家庭、上班，或是因為在許多國家的再生能源要價更高，而使得公司無法負擔再生能源的使用。由此可見，帝國生活形式於全球北方的維生體系中物質化、制度化，使得這些工人們被迫成為此種生活形式的實行者。

> 北方—南方關係

帝國的生活形式，意味著一種全球規模的階層制度：自殖民主義出現以來，全球南方經濟體中，以原料採集、工業生產為主要形式的勞動與生活環境，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符合資本主義中心的經濟需求。家庭階級、性別關係、種族關係並非獨立於這些需求之外，其在本質上即是以這些需求為導向。

提出帝國生活形式此一概念的目的，即是要將新殖民主義之下的南方—北方關係呈現出來並作出解釋——統治、權力與暴力，如何於階級、性別以及種族層面，在消費與生產實踐之中被正當化，最終被認為是可被接受的？許多女性，尤其是被種族化的女性，在勞動分工中處於較低的地位，其勞動與身體皆受到更大程度的剝削，貧窮出現了女性化的趨勢。這套生活方式在地理上擴展至半資本主義的國家，並深植於社會當中。

當前的全球整體以及其歷史構成，同時具有生產性與破壞性特徵；其是由不均衡的發展與相互依賴、危機傾向與帝國生活形式維持穩定的因素等面向所形成，然而這些逐漸加深的危機，卻有部分同時也是解決危機的要素。

如此矛盾的動態，可以由人們嘗試以電力取代汽車引擎的案例來說明。倡議此方案的經濟、政治與科學人士宣稱，由於交通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因素，這樣的作法將成為氣候危機的有力

解方。然而，電動車實際上對於克服環境問題幾乎沒有任何幫助。原料取用只是從化石燃料轉變為金屬原料，電動車仍然會在全球南方的礦產地帶中，帶來嚴重的環境破壞，由汽車凌駕於腳踏車、行人、公共運輸工具之上的交通情況依然存在。

由電動車為主打的「綠色經濟」，宣稱其能帶來更高的投資利潤與就業機會，並緩解生態危機。與此同時，其仍然停留在服膺於資本主義生產與生活形式的基礎之上，無助於在生態現代化的走廊上更進一步。綠色資本主義的形成，將導致如歐洲綠色協議這類的綠色經濟策略出現，其可能有助於處理近年來日益明顯的社會、生態矛盾。然而，這套策略的實行，是以空間外部性和時間有限性為前提，在此情況下，社會與環境成本將持續產生，並在空間和時間上外部化。

> 待討論的啟發性思想

「帝國生活模式」帶來的啟發性思想，同時借鑒了全球北方／全球南方的豐富知識傳統。值得在此提及的，是拉丁美洲的批判性思考對於不同領域的貢獻，例如對於依賴理論與政治生態學的討論，以及「結構異質性」(caudillismo)、秘魯社會學家 Aníbal Quijano 提出的「權力殖民」(coloniality of power)、由 Edgardo Lander 提出的「知識殖民」(coloniality of knowledge)等概念。

繼續這些方法之間的對話，並進一步應用於實證研究，將幫助我們理解帝國生活形式，以及其日益增長的矛盾。更重要的是，這將有助於我們注意到危機發生時，可以使用的替代方案；並認知到那些被預設的常態，並不是那麼正常。藉此，我們將能更深入地探究，團結的生活形式具有何種潛力以及輪廓。■

來信寄至：

Ulrich Brand <ulrich.brand@univie.ac.at>

Markus Wissen <markus.wissen@hwr-berlin.de>

1. Brand, U. and Wissen M. (2021)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Everyday Life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Capitalism*. 倫敦: Verso.

> 拋棄人類世：資本世中的人類與自然

Jason W. Moore, Binghamton University, 紐約, 美國



來自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的街頭藝術版「大魚吃小魚」。
來源：Cecily Bang。



人類世是新千禧年時代最具影響力的環境主義概念之一。但這樣的概念是否也是一個重大的威脅？

人類世？「人類」的世代？這樣的詞彙看起來沒什麼問題，而且很科學。氣候危機的嚴峻現實被認知為一場重大的衝擊、一個關於墮落的故事——人類「戰勝了強大的大自然」。對於地球系統科學家來說，人與自然之間的衝突絕對是無關政治的；然而現實卻不是如此。這些致力於尋找「金釘子」(golden spikes)——尋找地質人類世的學者於是開始編造一套關於人類的故事。他們以科技與人口統計，取代了圍繞著現代性歷史的爭議論述——「人口人類世」(Popular Anthropocene)就此誕生。支撐這個概念的兩個要素，是瓦特蒸汽機(1784)以及「人類的快速擴張」。如果說歷史本身是糟糕的，那麼其中蘊含的意識形態可以說又更糟了一點。因為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並非與此無關，帝國資產階級霸權的制度就是藉其運轉。Thomas Malthus 的反革命小冊子(1798)是在前所未有的社會激進主義中出現的；Paul R. Ehrlich 的《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 1968)問世時，工人、農民和學生的抗爭正威脅著戰後的資本主義。與如今的

人類世相同，在這兩個時期，社會與生態之間的分裂，在自然主義的洗禮台上被消弭殆盡。這件事傳達的訊息是：不要注意事情背後的操偶人。我們所能期待的最佳結果，就是「自然法則」能夠自行做出有效的管理。

> 人與自然，從資產階級自然主義到「別無選擇」

如果你曾經覺得世界末日比資本主義末日更容易想象，這就是原因所在。資產階級自然主義將那些試圖追求公理與民主的抗爭從歷史上抹去。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口人類世只是一種絕望的生態學。我們別無選擇——這就是環境主義者對新自由主義教條的詮釋，人們只能接受行星管理的必然性(就連這點聽起來也不太實際)。人類與自然的觀念對於我們如何想像環境而言，是一種完美的鴉片，這個概念只會和我們說：「世界末日已經來臨」，卻從來不曾試圖定義、甚至打破背後的系統。自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這樣的觀念促使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士和管理階層，誠心地向人們表達他們內心深處的懊悔與焦急，然而這樣的告解在政治上卻毫無用處。與此同時，那1%的人們則將我們推向行星的地獄。

>>

可以說，「人」與「自然」並不與此無關。這兩個詞彙（以及它們的同源詞，如社會）直到1550年資本主義歷史的轉折點之後，才有在現代英語中有了意義。那是個氣候危機、極度無產階級化和種植業革命的時代。在這個動蕩的年代，人與自然形成了一組支配性的抽象概念：為了服務無止盡的積累，而重新組織人類和其他生命之網的一套實用指南。在文明化的推進中，這些抽象概念構成了一種支配的意識形態——人類是在自然之上的。這種意識形態使現代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得以可能，這一切都被資產階級自然主義，以及人們基於過去的歷史而發展出的獲利動機扣連起來。這便是資本世（Capitalocene）的開端——一個結合了統治、開發和環境形塑等策略的地質年代。

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個權力、利潤和生命的世界生態系統，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的影響範圍。資本世將階級剝削和盈餘積累，在生命之網中編織出新的形式。1492年，資本主義盤古大陸被創造出來，成為了地球史上的一個生物地理分水嶺。1610年的世界指標（Orbis Spike）——在Maslin 和 Lewis 看來，標誌出了人類世的地質起源——則成為碳減少金釘子，是種族滅絕的直接結果，種族滅絕本身也是由奴隸制度和其他淺薄的、對自然的認知與策略而驅動的。

> 普羅米修斯主義：歷史資本主義地理文化邏輯

這些策略並不是將資本積累概念去實體化的邏輯，而是藉由一種新穎的地理文化統治模式——普羅米修斯主義所實現。在這套概念裡，與人類這個物種無關的「人」站在自然面前，就如同上帝站在人的面前。對16世紀的西班牙人來說，善良的基督徒通過努力工作，可以拯救部落民族在本質上的不完美。作為帝國活躍於各地的原則，普羅米修斯主義使得帝國的牧師、士兵、商人和種植園的擁有者，迅速地「發現」了殖民地人民的野蠻、非理性，因此不夠符合文明。只要將這些民族——原住民、非洲人、凱爾特人、斯拉夫人和無數其他民族——一一歸化，他們就能變得更文明。帝國成為了「學習文明的學校」；於是之後每個帝國都為野蠻人帶來文明，以及後續的「發展」。

這和氣候危機，還有人類世又有什麼關係？全部都有關係。大自然成了資產階級不願付出代

價保護的事物。將自然視作廉價的存在，是一種統治、資本累積的策略，其和賦予物品價值的「經濟」時刻，一同被作為貶抑地理文化價值的、前所未有的的一套制度——這即是資本世的核心概念。

接下來，我們可以先回過頭來對 IPCC 近日的聲明，進行批判性的反思：「人類造成大氣層、海洋與陸地的暖化是無庸質疑的。」這樣的敘述當然是事實，不過仍然太過片面了，因為「人類造成了這件事」，其實是最服膺於意識形態的論調。我們有正當理由質疑此種氣候變遷的責任分配是否平等，因為這樣的責任分配方式，是處在一個意圖達成極度不平等財富與權力分配的體系之中。

將氣候變化視作人為（Anthropogenic）的影響，似乎成為了一種指責剝削、暴力、貧窮受害者的方式。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找到其他更精確、更好的說法嗎？我會說，我們身在一個「資本造成的」（capitalogenic）氣候危機的時代；意即，所謂的地質人類世，是由資本，而不是人類所造成的。1854年至今的工業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三分之二是由90家公司所排放的。如今，最富有的1%人口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則是最貧窮的50%人口的兩倍。

> 資本造成的氣候變遷：走向資本世的安樂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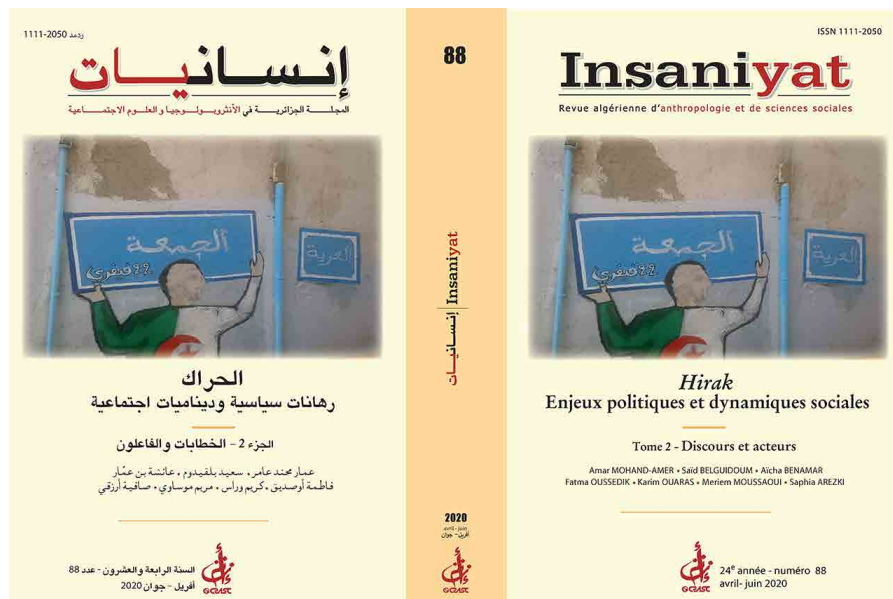
要理解現今的氣候政治，我們需要重新思考1492年以來，在普羅米修斯主義旗幟下展開的階級政治。資本世的觀點使我們認知到，支配、積累和環境形塑的模式，是21世紀氣候危機的核心。最重要的是，其將地緣政治經濟，以及地理文化對生命網絡的支配，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來，揭示了「資本造成」的三位一體：氣候階級分化、氣候種族隔離、氣候父權體制。知識分子面臨的挑戰——同時也是政治的挑戰——即是要將世界歷史之下，生命、統治與積累的網絡納入討論。相對於綠色巨人的行星管理主義，我們也許能開始嘗試，勾勒出一種工人階級的政治；不再將生命之網視作由特定人掌控的事物，而是將其視為在世界各地爭取解放與公義行動的同盟。■

來信寄至：

Jason W. Moore <jwmoore@binghamton.edu>

> 馬格里布社會學： 歷史與展望

Mounir Saidani, University of Tunis El Manar, 突尼西亞,《全球對話》阿拉伯世界區域編輯, ISA 執行委員會成員 (2018-22)



Insaniyat (人文), 阿爾及利亞的文化和社會人類學研究中心 (CRASC) 期刊。

《全球對話》為馬格里布地區的社會學家提供了傳達他們研究生產過程和想法的機會，這是讓原本不被重視的聲音被聽見的絕佳機會。坦白說到目前為止，「本土」社會學家以及離散在世界各地的學者都鮮少去爭取曝光。即使英語系世界和法語系世界的情況不同，情況也是如此。過去十年我一直密切關注的《全球對話》是馬格里布社會學家應該利用的難得機會。當《全球對話》編輯提議讓北非的馬格里布地區的社會學家發表意見時，其阿拉伯語世界編輯團隊決定邀請整個地區（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毛里塔尼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的社會學家參與。不幸的是，我們只接收到三篇投稿。

第一篇文章簡要介紹了利比亞社會學教學和研究的歷史。利比亞社會學家 Mohammad Eltobuli 回顧其社會學學科歷史，可以追溯到利比亞大學的創立和第一個社會學系的成立，並對該學科在該國的後續發展提供了有趣的見解。在第二篇文章中，阿爾及利亞歷史學家 and 社會學家 Hassan Remaoun 讓我們重溫1960年代初期以來阿爾及利亞社會學的后殖民轉向，並詳細介紹了阿爾及利亞大學社會學教學和研究的現狀。在第三篇也是最後一篇文中，我探討了突尼西亞社會學家在面臨三重危機挑戰時的表現。這種分析融合了社會學史和社會學，目的是為了發起突尼西亞社會學家之

間，關於區域和全球領域的討論。

這三篇文章指出了馬格里布社會學的成就和不足。馬格里布社會學具有相當長的歷史，而在文章中有揭示出其中一些面向，並提出了幾個科學問題：典範身份 (paradigmatic identity) / 知識生產的身份；地方 / 區域科學社群的結構化；其在國際社會學派和潮流中的位置等等。因此，這幾組短文的目的是在於引起國內、區域中和國際性的對話和反饋。■

來信寄至：

Mounir Saidani

<mounir.saidani@issht.utm.tn>

> 利比亞的社會學

Mohammad Eltobuli, University of Benghazi, 前班加西大學校長, 利比亞



利比亞最古老的大學——的黎波里大學的校徽。

1955 年利比亞大學在班加西市成立時，社會學成為了利比亞的重要學科。藝術與教育學院設有五個主修：阿拉伯語、歷史、地理、哲學和社會學。學院開始時有 33 名男學生，其中 13 名是社會學學生。1959-1960 學年，九名第一批的學生畢業。社會學系隨後改為哲學和社會系。1972-73 年間，兩個系各自獨立成不同系。1966-67 年間，的黎波里成立了教育學院，並於 1971-72 年在那裡開設了社會學系。

> 進一步發展

1959 年發現石油後，利比亞發生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變化，利比亞政府開始更加重視普通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許多研究生被派往海外，特別是到美國和西歐攻讀研究學位。

由於利比亞在發展高等教育中，需要更多的教職員在新成立的大學和社會學系任教，印此派送了更多的研究生到國外。一旦他們畢業，就開始回國進行教學工作和協助當時各校社會學系的外籍教師。到了 2002-03 年，利比亞社會學系有超過 27 名教職員工。這些系開設了各種社會學課程，包括社會理論、研究方法、社會統計學和數據分析，並將其作為核心課程。此外，也有其他課程包括：社會變遷、現代化、人口學、工業社會學、社會議題等。

這裡聚集了數千名從全國各系畢業的學生，如此龐大的畢業生數量和越來越多的合格教職員工導致了國內對研究生學習的關注。這也是由於利比亞與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之間正在發生的外部衝突。利比亞的研究生課程主要開設在兩所主要的大學內：班加西大學和黎波里大學。目前，大多數科系至少會提供社會學碩士學位。利比亞教育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 1988 年在的黎波里成立的利比亞研究學院。它在班加西、米蘇拉塔、德爾納和艾季達比耶都設有分校。該學

院提供不同領域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如科學、工程、法律、語言和文學以及社會科學。

大多數研究生在社會系主要關注利比亞社會問題，例如現代化和發展。現在，注意力轉向與全球化、(後)現代化、貧困、國際衝突、流行病等相關的問題。

> 諸多挑戰

這就是社會學如何在利比亞大學和利比亞研究院內扎根成長，成為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學科之一的脈絡。與此同時，利比亞的社會學也面臨許多困難，其中包括大學部和研究生課程都缺乏固定的師資。這是因為，大多數來自鄰國的教師在進入其他學校，尤其是波斯灣阿拉伯國家之前，都會在利比亞短暫地任教獲取教學經驗。另一方面，在利比亞大學任教的教師大多是他們原本大學的知名學者。

其他遭遇的困難還包括圖書館不足和缺乏書籍和期刊，以及缺少指導教授來指引學生選擇正確的研究課題、理論或

方法。為了闡明這些問題，我將參考我的同事 Omran M. Al Gueeb 的訪談，他曾在全國會議上發表過一篇處理利比亞社會學的文章。除了以上的問題之外，他還提到了在研究生的學習上缺乏了確實而明瞭的策略。這樣下來的後果是，學生跟指導教授選擇的主題幾乎與利比亞社會沒有關係。

由於提高了大學部和研究生課程的品質，並在 1990 年代初在各大學和學院設立了品質管控辦公室，讓情況終於有所改善。課程中引入了社會學各個領域的紮實課程，並且在研究方法、社會學理論、社會統計和數據分析方面，都有稱職的師資加入學系。這些努力帶來

了回報，因為利比亞學生現在在國外攻讀更高的學位是沒有問題的。

> 結論

以上描述了利比亞的社會學，是如何隨著五十年代中期利比亞大學的成立而紮根，並經過多年發展成為大多數利比亞大學中最重要的學術領域之一。另一方面，其也面臨著許多影響其發展的問題，包括課程淺薄，特別是在理論和方法論方面。利比亞學者與其他地方的許多學者一樣，未能發展自己的理論，也未能應用西方理論來分析利比亞的社會現象。然而，由於西方和其他大學的社會學畢業生人數不斷增加，

社會學在利比亞社會科學中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更加堅實的領域。此外，許多社會學畢業生成為利比亞政府機構的領導者，其中一些人在社會事務部門和教育部等擔任非常高的職位。■

來信寄至：

Mohammad Eltobuli

<Mohammad.Tobuli@uob.edu.ly>

> 阿爾及利亞的社會學： 教學、運作與地位

Hassan Remaoun, University of Oran 2, 已退休教授, 阿爾及利亞奧蘭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中心(CRASC)研究副主任



2019-2020年發生於阿爾及利亞的「Hirak」(阿拉伯語)社會運動。
來源: 創用CC。

如何簡潔地討論當今阿爾及利亞社會學等學科的運作和地位問題? 簡而言之, 我認為至少要考慮到三個方面:

- (1) 社會學教學及其引入阿爾及利亞大學以來的演變。
- (2) 學科的社會需求和機會。
- (3) 其在知識領域的地位, 以及相對於其他社會學科的整體動態。

> 社會學的教學

直到 1962 年, 阿爾及利亞大學才將社會學的教學和使用引入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前主要是透過法國學界的中介, 在獨立之後才遵循涂爾幹的社會學傳統)。這門學科剛開始依附在其他學科上, 例如: 哲學, 並在之後才建立道德和社會學的證照系統。社會學和研究博士學位可追溯回1958年, 同年文學學院改制為文學與人文學

院。1962 年 7 月獨立的阿爾及利亞繼承了這種模式。在接下來的幾年裡, 阿爾及爾大學取得四項高等教育證書(CES)教授的社會學學位: 一般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和社會經濟, 以及可選修的北非民族志或人口統計。

從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開始, CES 被拆成幾個主題性的教學領域, 整合了理論與社會實踐或指導工作以及教程, 同時第一年的實地實習也包含在內。教學為期四年, 兩年的核心教學再加上兩年的專業化課程, 最後再撰寫論文。與此同時, 自 1958 年以來一直僅限於阿爾及爾及其附屬於 Oran 以及 Constantine 的大學數量, 如今已增加到了幾十個。根據他們的策略, 這樣可以開設一個或更多種不同的社會學專長(工作社會學、城市社會學、農村社會學、文化社會學、政治

社會學等)。該教學最初採用兩種不同的教學語言(阿拉伯語和法語), 接著在 1980 年代初完全阿拉伯語化。而哲學和歷史則早在 1970 年代就已阿拉伯語化。這邊還應該提到的是, 文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即在歐洲通用的 LMD 系統), 大約在十年前就被採用。最後, 我想指出, 除了涂爾幹和韋伯的傳統之外, 幾代阿爾及利亞社會學家在他們的理論方法上受到了 Ibn Khaldun 和馬克思的影響, 也受到了 Pierre Bourdieu 和 Jacques Berque 的影響(特別是影響到阿爾及利亞和馬格里布)。

> 學科的社會需求和機會

隨著大學體制在國內的不斷擴張, 以及在人口激增之下對教育系統產生的強烈影響, 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社會學家進入勞動力市場。但並非所有

人都從事與社會學直接相關的工作。他們根據工作市場的需求出現在各式各樣的職業中，主要是在公部門（行政、教學、新聞、警察、經濟部門等），但也有在私部門的人。事實上，學習社會學的學生通常只是因為招生系統依照他們的分數將他們定位到社會學系，尤其是當他們的分數接近獲得人文學科所需的最低平均時。

然而，不管是公部門或私部門都需要社會學家。公共機構尤其需要統計調查方面的專業知識，例如人口普查（可追溯到1850年），而這些調查需要在特定地點進行評估和規劃。這裡舉幾個例子：社會福利、社會運動的預測和控制等，更是需要社會學專業知識的其他議題。公部門主要偏好實證調查，而社會學家在大學教學和研究的方式也受到肯定，後者正是透過大學論文、大學實驗室和國家研究中心進行。因此，1998-2002年關於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方向，和五年計劃列出了30個國家研究計劃，其中10個直接或間接涉及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的「人口與社會」計劃列出了118個主題，分成32個主軸和7個研究領域：（1）城市和空間（2）農村空間（3）家庭、婦女和社會（4）人口遷移和空間分佈（5）工作就業（6）社會流動（7）知識、表達和想像。

> 地位和角色

阿爾及利亞獨立後出現的民族國家，繼承了殖民遺留下來的大学和科學體系。然而，其受到了批評，特別是在社會科學和人文領域更是如此，其認為這是使殖民秩序永久化合法化的一種手段。這種情況在歷史學、民族誌，甚至是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等學科的種族主義預設之下顯得更加真實，在殖民精英接受培訓的大學中運作的「阿爾及爾學院」更是如此。因此，這個年輕的國家必須根據自己的目標重新構建知識領域，首要目標是恢復長期以來被侵犯的國族認同，以及重建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

因此，人類和社會的科學或是運用他們的研究者，必須在兩個典範的框架內重構自己：

第一個，出於身份認同，以史學（或更確切地說是國家歷史）為主，包括哲學、神學（伊斯蘭科學）、Fiqh（伊斯蘭法學）、阿拉伯語研究，以及與人格和教育相關的心理學。

第二種由發展主義支持，由可以促進社會經濟和現代化的學科構成，包括社會學家、地理學家、語言學家、臨床或工作心理學家。

在這種總體脈絡下，社會學與所有其他被提到的學科一樣，在其自身的認識論和制度與意識形態上的壓力之間陷入困境。從這個角度來看，協商和規避是永遠的誘因和作法。這裡還應該指出的是，幾十年前相對邊緣化的人類學現在正在大學課程中重新被重視和建立，有時還會與社會學融合，被置於社會人類學的框架內。■

來信寄至：

Hassan Remaoun

<hassan.remaoun@gmail.com>

> 突尼西亞社會學： 面臨三重危機

Mounir Saidani · University of Tunis El Manar, 突尼西亞,《全球對話》阿拉伯地區編輯,ISA 執行委員會成員 (2018-22)

CERES是突尼西亞第一個社會研究中心,成立於1962年。
自1964年以來,持續出版突尼西亞社會科學期刊至今。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突尼西亞本來一直被認為是個不斷變好的社會。然而，在 2010 年至 2011 年突尼西亞革命之後不到十年，分析家就不那麼樂觀地書寫失敗和危機的故事。去年，健康危機已成為社會危機，使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陷入貧困。突尼西亞面臨的危機同時有三個層面：經濟、政治和衛生。

我接下來要回答的問題是：突尼西亞社會學家如何應對這場震撼突尼西亞的三重危機？

我首先將呈現突尼西亞社會學家大致的情況，再評估目前盛行的研究典範，最後評價參與公共討論的社會學家。總結的部分，我會嘗試呈現度過危機往前進的方式。

> 組織薄弱的科學社群

2021年舉行的國際法語社會協會 (AISLF) 第 21 屆大會是在突尼西亞舉行的第二屆大會。然而，儘管突尼西亞參與該協會已經一段時間，但並沒有成功抓住為突尼西亞社會學增加受眾的機會。突尼斯參加 ISA 科學會議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但只有少數突尼西亞社會學家在隨後的會議中註冊。在突尼西亞成立的阿拉伯社會學協會(1985)的衰弱，是突尼西亞社會學家公共參與低落的另一個例子。但是，他們確實參與了阿拉伯社會科學理事會(ACSS)的幾乎所有活動，以及全球阿拉伯復興研究所 (ARIG, 成立於 2019 年) 和阿拉伯社會研究國際網絡(成立於 2020 年)。一些更著名的突尼斯社會學家也參加鄰進國家的社會學活動——例如視訊會議、會議和講座。

突尼西亞社會學家參與國際活動時尋找網絡連結、對話和認可。然而，這些參與者都只是個體式的投入。這種獨自投入的眾多原因之一是突尼西亞社會學缺乏任何社會學界自主的組織社群。突尼斯社會學協會(成立於 1988 年)在過去四年中幾乎沒有舉辦過任何活動。其第三期 Al Muqaddimah 期刊(也是最後一期)已經是2010年的事了。其三年一次的大會截止日期早就過了幾個月。在新一代突尼斯社會學家普遍感覺被老一輩排斥，因此他們也排斥老一輩作為回擊。如果不與突尼西亞阿拉伯與政策研究中心等在財政和組織上更強大的科學機構合作，幾乎不可能舉辦社會科學活動。

有這種結構薄弱的網絡，這樣的社群很難應對每天變化的社會學環境。然而，我認為突

>>

尼西亞社會學家也表現出應對社會變化的無力。這種無力與迄今為止流行的研究典範有關。

> 一個拒絕社會變遷的典範

就像他鄰近的北非國家，當代突尼西亞的社會學教學和研究是建立在殖民遺產上。後殖民-但未必是去殖民-社會學繼承一種從上而下由國家主導社會變遷的願景。在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社會關係框架下，探討發展主義-現代化的社會學是非常膚淺的。由於這樣的淺薄，讓公民社會在解構/再構民族國家的權力部屬中佔據微小的位置。威權政府本身是歷史變遷的行動者。突尼西亞民族國家的概念被視為純粹的幻想和發明，他無法控制其自身的歷史意義。因此，當2010-2011年突尼西亞革命發生時，這樣的革命不符合當時流行的社會變遷分析典範。

2010-2011年革命的歷史轉折清楚地顯示，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學言究典範來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現有的研究典範使社會難以理解、概念化國家當前的情況。

同時，新冠肺炎危機進一步使理論典範的討論更加複雜。自1960年代後期以來在該領域研究的突尼西亞社會學家借用牟斯的概念，將COVID-19視為總體社會事實。這是對社會變化的觀察的極具呈現張力的描繪。但只有少數社會研究在討論客觀性/主觀性、內部/外部、地方/全球和歷史/結構等問題。要擺脫舊的流行觀點，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來自底層的社會聲音尚未迫使社會學家重新思考他們的分析立場。

朝向新典範的轉移是一項大膽的舉措，而且才剛剛開始。除非更廣泛地傳播社會知識，否則它不會成功。

> 不公共的社會學

突尼西亞社會學和科學界之所以難以面臨上述的困難是因為社會學知識仍然是菁英主義的。造成這種情況的第一個原因顯然在於長期的獨裁統治，在這種情況下，突尼西亞大學與社會隔絕，社會學者被排除在社會討論之外。事實證明，公共討論的缺席問題是突尼西亞社會學家面臨最令人擔憂的問題之一。

至於突尼西亞的社會知識的具體特點，值得強調的是語言議題至關重要。一方面，儘管突尼斯的社會學早在70年代中期就開始阿拉伯語化，但至少部分是用法語授課。老師向學生展示主要概念時，通常會附上法文相對照的概念。雖然英語使用上極少，但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用法語進行的。另一方面，在準阿拉伯語化的情況下，社會學知識和發現仍然難以普及。因此，人們是可以主張說因為科學術語的使用緣故，社會學話語很難擴展。在挑戰其他更根深蒂固的社會話語時尤其如此。在一個陷入不可阻擋的社會變革使得不同的社會論述彼此差異不大。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科學的聲音難以凸顯。因此，突尼西

亞社會學家很難在公共辯論和公共領域中作為理性專家，難具有正當性。

> 結論

本文展示了突尼西亞社會學在歷史中如何受到挑戰。這篇文章提供過去十年來社會學受挑戰的見解。突尼西亞當前的三重危機是突尼斯社會學的又一個轉折點，但似乎沒有很好地處理。

本文旨在激發對突尼西亞未來的深入討論。引發這種討論的一種方法是彌補不同世代突尼西亞社會學家之間的隔閡、個體職涯需求和集體行動。必須在地方、區域和國際層面同時增強他們的網絡能力。在我們全球化的世界中，這樣一個具充分準備的突尼西亞社會學可以為國際社會知識的進步做出寶貴的貢獻。■

來信寄至：

Mounir Saidani

<mounir.saidani@issht.utm.tn>

> 從對疫情的回應 看不平等問題

Wilma S. Nchito, University of Zambia, 尚比亞



於卡桑巴學校以及另外58所學校，所設置的大型洗手站。

來源：盧薩卡水安全倡議組織 (LuWSI)。

當 2020 年 4 月初尚比亞宣布首例肺炎病例時，從社交媒體上的一連串評論就能看得出來，許多人都認為這種疾病只會部分影響社會而已。由於那位個例剛從歐洲度假回來，也因此助長了一種看法，認為越富裕的人越容易感染這種新疾病，而一般平民則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隨著第一波疫情的進展，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受到最大影響的確實是富裕的社區。而這使得公共健康資訊難以傳遞到計畫外的居住區和農村地區，因為他們通常會問：「你有見過死於COVID-19的人嗎？」在沒有切確證據的情況下，疫情對許多人來說仍是一個騙局。有些人會抗議說，這只是政府為了獲得捐款的方式罷了。

> 第二波疫情

第二波疫情與第一波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陰謀論卻是越演越大。長久以來，低收入社區的居民都很少注意到公共健康的警告，大家都認為沒必要戴口罩。在城市的某些區域，戴口罩反而

會被認為是在傳播病毒。這顯然地是一個有關兩個城市的故事，一邊有帶口罩，另一邊沒有。雖然國家層面當時有應對 Covid 並對其採取行動，但畢竟很難知道住在計畫外居住區裡的基層人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到底有哪些措施為這些人口稠密的地區在隨後的數波疫情做好準備？這就是路沙卡水安全倡議 (LuWSI) 派上用場的時候。LuWSI 是一個涉及公共與私營部門、民間社會、社區組織 (CBO)、當地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多重利害相關人之協作系統。LuWSI 要達成的目標是：「人人享有用水安全，並維持一個健康繁榮的城市」。該倡議於2016年在德國國際合作機構 GIZ) 自然資源管理計劃 (NatuRes) 的支持下啟動，現已發展成擁有30個合作夥伴的組織。雖然這些合作夥伴都有自己的核心目標，但他們也一起共同努力改善城市的水安全。

> 基層民眾對 Covid 的回應

當 Covid 病例在 2020 年年中開始在該國上升時，LuWSI 的合作夥伴就在思考該如何為

>>



為推廣洗手而向學校捐贈的水箱。
來源：LuWSI。

改善低收入社區的衛生習慣盡一份心力，因為在 Covid 疫情之下需要增加平時的用水量和購買額外的肥皂和消毒劑。低收入社區已經竭盡所能地想辦法度過每一天的生計，而 COVID-19 現在又為家庭支出上帶來了另一項成本。因此，LuWSI 的合作夥伴們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介入措施。儘管尚比亞的死亡率相對較低，但他們仍是持續致力於設計出不同的方式幫助貧困社區。目前他們已經在路沙卡市內實施了數次介入措施。這包含一些最初步的協助方式，像是對市場清潔及消毒、提供洗手台和肥皂、設立「腳踏式」洗手站，以及提高對 Covid 的認識等活動。

儘管低收入社區的學童是病毒的潛在帶原者，但他們卻接收不到任何消息和得到介入措施的幫助。意識到這一點的路沙卡市議會，在綠色學校夥伴計畫(Green Schools Partnership Programme)下發起了「安全返校運動」(SB2S)，擴大幫助到全市100多所學校。主要合作的夥伴是水援助組織(WaterAid)、路沙卡市議會、教育部和衛生部。SB2S 運動包括了對社區成員進行居家照護的培訓、改善學校對 COVID-19 的態度以及促進衛生情況等。在這項運動中，學校配備了數個「腳踏式」洗手台，以防止學童在洗手時交叉感染。此外，學校還配備了大型水箱以緩解缺水問題。

LuWSI 進行介入的另一項方式是在分區下制定 COVID-19 的響應計劃。區域發展委員會(WDCs)專精於溝通技巧方面的培訓，這讓他們能夠在社區中去講述有關 Covid 的故事。在經過 WDC 的培訓之後，基層社區的民眾將會得到個人防護設備(PPE)的材料，去執行 LuWSI 下另一項進行中的介入計畫。在這項新倡議下，參與 COVID-19 響應計劃的 WDC 將獲得手套、清潔劑、消毒劑、肥皂、消毒用的氯、滾輪垃圾桶、掃把和水箱等物資。

> 成功的一小步

本文所提到的介入措施可能會顯得有點局限且規模較小。要是有人問：LuWSI 協作平台如果沒有干預這些低收入學校和社區會發生什麼？答案也很可能是「什麼也不會發生」。顯然，中央政府已致力使用 Covid 下應遵循的指導方針去教育民眾。政府還發布命令，要求學校和營業場所必須確保能提供足夠的消毒或洗手的設施，但大多數學校及社區服務都難以負擔得起這些疫情所帶來的額外要求。在這種情況下，LuWSI 會整合平台上不同合作夥伴的資源，為低收入社區提供即時的幫助。這個協作平台已經表示，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成功協助中央政府對抗病毒。■

來信寄至：

Wilma S. Nchito <wsnchito@yahoo.com>

> 以 Kuhn 的哲學理解 Ibn Khaldun 的典範

Mahmoud Dhaouadi, University of Tunis, 突尼西亞, ISA歷史委員會(RC08)、宗教社會學委員會(RC22)、語言與社會委員會(RC25)



Ibn Khaldun 於突尼西亞的雕像。
來源：M. Dhifallah／創用CC。

本文聚焦於 Ibn Khaldun 在著名著作《神學緒論(The Muqaddimah)》中的發現，他所發明的新科學，阿拉伯語為「Ilmu al umran al bashari」，即「人類文明和社會組織的科學」。我將使用現代哲學的科學視角，和 Kuhn 的概念如典範、常態科學和革命科學，來說明導致 Ibn Khaldun (1332-1406) 發現「新社會科學典範」的過程。

熟悉現代哲學科學文獻，與捕捉《神學緒論》作者的革命科學精神習習相關。我概述了 Kuhn 的概念，以了解他所謂從常態科學到革命科學的轉變，並評估 Ibn Khaldun 的社會想法。

> 典範的概念

在日常對話中，「典範」一詞用來表示被複製或遵循的常見案例或模型。一般來說，正如 Kuhn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所言，相關科學界對要遵循的理論和方法論規則、所使用的工具、要研究的問題，以及檢視研究的標準，有一個共識。這種共識源自科學界採用一些過去的科學成就作為其「模型」或「典範」。以下會繼續論述，這種「典範」的概念徹底改變了對科學哲學的思考。

> 常態和革命科學

在他的書中，Kuhn 提到兩種科學：「常態科學」和「革命科學」。Kuhn 認為常態科學是科學家在其領域內共享的知識、概念、理論和規則。偏離這一點將使他們被該科學領域驅逐。因此，常態科學是建立在科學界知道世界是什麼樣子的假設。常態科學將過去的科學成就，視為其下一步實踐的正當性基礎。為此，常態科學經常壓抑基礎的革新，因為這必然會顛覆它的基本保證。因此 Kuhn 解釋，常態科學可以透過科學成就的「累積過程」來取得進展和進步。

然而 Kuhn 指出，科學革命是一個「非累積」的發展過程，舊的典範被無法相容的新典範全部或部分地取代。Kuhn 認為，導致「典範轉移」的科學革命類似政治革命。後者起於社群成

>>

員漸漸意識到，現有機構已不再充分解決他們創造的環境所帶來的問題：「異常」和「危機」。從危機中的典範過渡到新典範，同時產生新的常態科學傳統，並非一個累積的過程。

> 阿拉伯穆斯林的史學危機

Kuhn 的觀點可以應用在 Ibn Khaldun 的科學道路上。Khaldun 科學道路的第一步體現在他對穆斯林歷史學家的「強烈批判立場」。他明確表達穆斯林歷史學正處於「全面危機」中。他的話，如下所示，非常響亮地表達了他對於那些歷史學家缺乏科學可信度的觀感。歷史學科，或 Ibn Khaldun 所說的「歷史藝術」，在他那個年代和之前的穆斯林世界似乎並非處於一個良好的狀態。用 Kuhn 的概念理解的話，穆斯林歷史學正處於危機之中，需要一種新的解決方案，亦即「革命性典範」，從過去穆斯林史學家所累積的知識傳統中分離出來。《神學緒論》的作者批評了不同時期的穆斯林歷史學家。這段引述描述了 Ibn Khaldun 對穆斯林歷史學狀況的看法：

傑出的穆斯林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進行了詳盡的收集，並以書籍的形式寫了下來。然而，隨後，那些無權參與歷史的人，將他們自己想出來或隨意編造的不實八卦引入這些書中，以及他們編造或修飾過後的虛假、不可信描述。他們的許多後繼者跟隨著他們的腳步，將聽到的資訊傳遞給我們。『他們沒有尋找』也不在意歷史事件和狀況的成因，也沒有排除或拒絕無意義的故事。『幾乎沒有任何努力被放在了解真相上面。』[...]對傳統的『盲目信任』是人類世代相傳的特性。』¹

> Ibn Khaldun 革命性的新科學

Ibn Khaldun 發現的新科學與 Kuhn 的革命科學典範相符。Ibn Khaldun 強調他的科學「並非累積過程的結果」。因此，以 Kuhn 標準來說，它確實是革命科學。《神學緒論》的作者承認「沒有人」寫過和他的新科學相關的題材：「事實上，我沒有遇過任何人沿著這些脈絡進行討論。」Ibn Khaldun 提到許多思想家和書籍，如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Mobethan》²，以及穆斯林思想家的書籍。他肯定自己的新科學並非受到這些書中思想的啟發：「我們在上帝的幫助下意識到了這些事情，沒有亞里斯多德或《Mobethan》的教導。」Ibn Khaldun 進一步描述了新科學的一些特點：「[新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門獨立的科學。[這門科學]有自己獨特的主題——人類文明和社會組織。這個题目的討論是新的、傑出的、有用的。」然而，Ibn Khaldun 對他嶄新創新社會科學的範圍仍然保持謙虛：「如果[...]我略過了某些重點，或者如果[這門科學]的問題與其他問題搞混了，那麼糾正的任務依然會落在挑剔的批評家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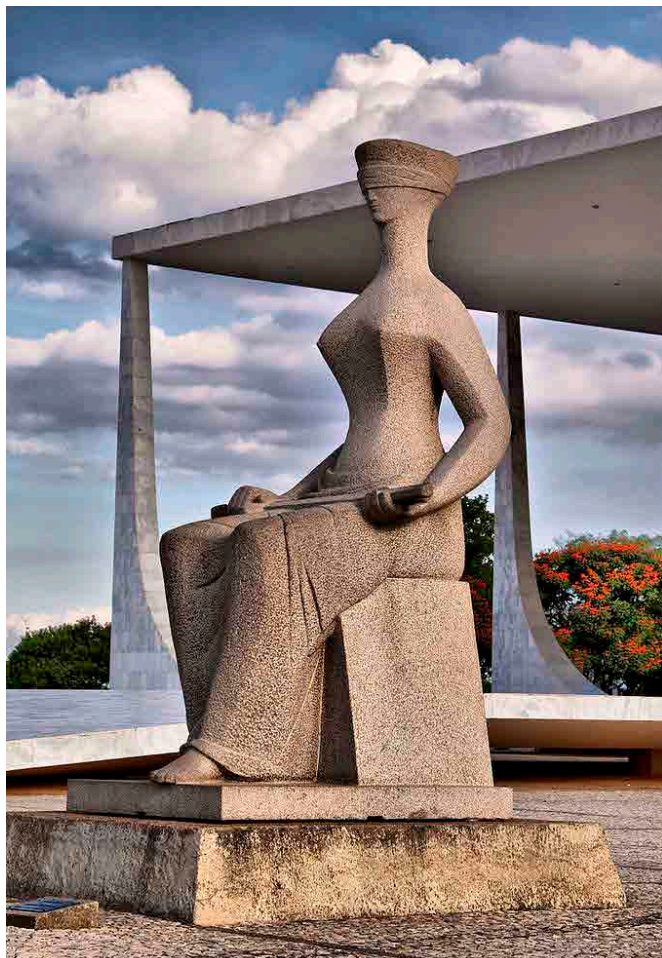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Mahmoud Dhaouadi <m.thawad43@gmail.com>

1. Khaldun I. (1980 英文版, F. Rosenthal 譯)《神學緒論》，vol. I :6-7。
2. Mobethan 是一本類似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的印度書籍。

> 社會想像與巴西的法律社會學

Francisco Bedê, 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 巴西, 以及 Gabriel S. Cerqueira, 弗魯米嫩塞聯邦大學, 巴西



Alfredo Ceschiatti 創作的《A Justiça》。這座雕像位於巴西最高聯邦法院大樓前方。

來源: Ricardo / 創用CC。

想像(imaginary)的概念在對當代巴西的法律運作情況的理解中愈發佔據核心的地位。它是一個關鍵概念,用以分析巴西法律下的社會系統以及社會動態和國家政治(作為法律社會學的對象)的其它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何影響現代生活之核心的價值與願望的具體化。上述現代生活包括:1)一種從屬於公民透過其代表而不是寡頭政治的規則的積極參與的民主政治生活;2)一種經濟上自主且有效率的國家發展;3)一種奠基於個人自由的社會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國家的有效運作僅發生在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度以內。

想像,在此應該理解為一種在主體的諸表象(representations)與諸實踐中形成的世界觀,也就是在能夠當作集體動態和制度運作的共同參照而加以動用的範圍內被Cornelius Castoriadis 稱為「社會想像」的那種東西。在這個意義下,想像的概念與意識形態的概念類似,只要人們不把意識形態僅僅理解為「虛假意識」,即對現實的錯誤表象,而更多地理解為那種為人們的具體行動提供意義坐標(coordinates of meaning)的東西。此外,我們將藉想像的概念勾起對如下事實的注意:世界觀往往是與那些不立即合乎邏輯的方面(如那些不能被僅僅化約為理性的方面)有著深刻連結的。這就是說,社會想像很大程度上在字裡行間(in between the lines;譯按:在中文的語脈裡或要理解為言外之意、旋外之音,表示在表象的背後有著另外的意涵)運作,喚起隱含的情感和意義。

> 現代法的抽象性

現代法的抽象性乃是法律社會學之所以應該連同考慮想像的概念的主要原因。現代法是根植於公民制度中的,後者將其中所有個體定義為既平等又自由的自主性主體及基本權利的承擔者。它預先假定了一個高度抽象的權利主體:一個公民是以他/她是自由的並與其他公民一樣擁有不可轉讓的權利之事實而被定義的。由此,那些超出抽象平等之範圍的現實及個人具體生活的諸方面便作為私人生活領域的一部分因而不屬於權利的對象而被法律加以拋棄了。從而,要成為現代法和現代合法性秩序(modern legal order)的一部分,就必須在此一抽象形式上被定義(所以即便是特定權利和所謂的「少數權利」都必須當作公民基本自由和平等的表達加以闡述)。

儘管此一抽象且「普遍」的法律框架的規範性基礎否決了任何專斷的和特殊的強制實施(此

>>

有鑑於現代法並非其法學家及律師們的意志及詮釋的表達，同一個法律框卻強迫其操作者將抽象的編碼(abstract codes)轉化為關於具體問題的具體決策。因此，決定性的方面不在於法律系統從屬於政治或特定行動者的利益(雖然這常常發生)，而在於從抽象法則到具體決策的過渡中，想像透過給出抽象法所不能提供的坐標而自身強加(imposes itself)。

> 將法律根植於社會想像

另一方面，在現代法的合法典範中所引介的(抽象的)公民觀念乃是以非公民空間的生產為標誌的。悖謬地，從絕對論者的主權權威到人民主權的轉換中，在重新將絕對論者的主權之政治內容重新分配給「公民」的同時卻留下了社會團體中缺乏政治權威的一個部分。倘若這一間距(gap)沒有在肯定性的法律秩序中得到明確的鞏固，那麼它便將繼續地存在於每一天的社會生活中。此一矛盾往往強加給了法律的操作者。

Walter Benjamin 是第一位注意到上述情況並嘗試發展一種尋求法與想像之內在關聯的詮釋的人物(可從多種方面證明)。根據這種詮釋，法律制度將會在其社會外部性(抽象法的地域)及法律設立的專斷性中的無理性之暴力之間構成性地分裂。此一法律同時(且同步地)是一種對「合理的」內容的宣言而又是一種專斷的「無理性」禁令。由於在法律制定的時刻，其敘事總已建立一個後驗(a posteriori)，上述的分裂因素便就在 Pierre Legendre 稱為「教條式秩序」(dogmatic order)的對法律的教條式詮釋中逆動地(retroactively)隱藏了。

透過這種方式，法律社會學的研究之門開通了，它細察一種內在化的社會想像，該想像圍繞現代性的分裂的法律秩序提供了一種闡述(一種世界觀)——我們可稱之為想像的根植(anchoring)。根據此一進路，人們可以探索以國家歷史形態為標誌的主體形式，該形式(再)生產於法律訓練的動態和法律實踐所帶來的社會關係並在法律體系中建立起內部秩序。

巴西法律能夠無限制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高度選擇性的方式處理大眾及統治階級的(非)合法性並不是偶然的。想像的秩序要取代法律自身固有的矛盾、衝突和不連續的部分(在現代抽象法及其任意且暴力的超我[super-egoic]基礎之間)，後者在法律上維持著此一行為並賦予其以正當性。是什麼授權予並正當化能把一個個體「因為他們的種族」而被關聯到整個犯罪集團的那種司法決斷？是什麼正當化了——儘管只是在法律論述的言外之意中——那些在巴西棚戶區中針對黑人及窮人的違法警察行動？或者每日出現在報章上的詭辯的決斷論(decisionism)？一種跨學科的理論-方法上的結合對於理解複雜且矛盾的巴西法律來說是必要的。這將不僅僅需要傳統法律社會學的教訓，而是同時需要結合哲學、精神分析及歷史，缺少了其中一項將無法恰當地看清法律領域中關於想像的中心觀念。■

來信寄至：

Francisco Bedê <franciscojuliaomb@gmail.com>

Gabriel S. Cerqueira <gabrielscerqueira@gmail.com>